

七

劳动资源的掠夺

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
颂英烈之功勋，扬抗战之精神。
www.krzzjn.com 图书馆藏书

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
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

www.krzzjh.com

我与伪满劳工供出

张子舟*

省民生厅动员科主管劳工供出事务。劳工供出计划是由民生部劳务司和总务厅合议，关东军许可之下作出劳工供出计划案，用公文附表由民生部通令到省公署。附表的格式：工事的种类；某工事需要的人数；供出日期（期间是六个月）；工作地点和劳工使用人（如军指关东军，或组如鹿岛组等）。动员科接到此项公文及附表后，按各市县的人口数目分配制表以同样方式通知各市县，各市县也同样分配到各区街村。按照劳工供出日期，由各该市县的劳务事业担当人员率领应该供出的劳工到安东省城集合。因为指定的供出日期不同，民生部来的通知也不只一次，所以一批又一批的供出。

1942年，有一次我代表安东省长到安东车站，对集合完了的由各市县供出的劳工讲话。当时的情形是：各个劳工背着一个小小的铺盖卷，蹲在站台上，神色不安，好像要上法场的犯人。更有大部分劳工的家属（大部分是劳工的父母、妻子），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掩面而泣。警察、宪兵挥动着木棒四下驱逐，一种凄惨情景真是令人不忍目睹。而我则恬不知耻地站在劳工面前，丧心病狂地扯直了嗓子，大声叫喊：“我们为了大东亚圣

* 张子舟在1940年至1944年任伪安东省民生厅厅长。

战的完遂，要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等等一大篇所谓激励辞。此外，还有日本军官的讲话。随后就由劳工使用人率领装上闷罐车，铁门上了锁，就这样像装猪似的装上，在闷罐车里大小便、吃饭、睡觉，到了换车站停下来就是两三天。有的要这样走十天半月，不等到工作地点就死了许多。

对劳工待遇最坏的是关东军雇佣的各包工组，如鹿岛组等。1942年秋天，本溪湖煤铁公司炭坑倒塌，压死100多劳工，我曾和省长丁超前去参加该公司举办的慰灵祭，死亡劳工的家属也去了。到现场一看，炭坑的倒塌完全是由于草菅人命所致。在炭坑倒塌之前，劳工们早已认为危险，不愿下去工作，而日本把头威胁逼迫下去，坑口将要倒塌的时候，不让往外逃命，活活葬身在炭坑之中。

每当地方人员去看望劳工，日本当事者让劳工穿上比较好的衣服，排队出迎，又花言巧语的说明对劳工怎样好。然而看到劳工神色不好，而且问话不敢回答，有的只回答很好两字，至于工作场所、住的宿舍，根本不领去看，理由是军事秘密。劳工就劳期间虽然规定六个月，但一再延期，这里就成了劳工葬身之地了。

劳工住的宿舍倾斜在山坡臭水沟两旁，一栋接一栋黑矮光线不足的房子，土炕上铺着又破又旧的席子，小小的铺盖卷一个个的摆在上面，苍蝇乱飞，肮脏不堪，一天要劳动10多个小时。

有一次，我去慰问鹿岛组使用的劳工。工事は修建桥梁，工程危险，强迫毫无技术的劳工去修筑。这些劳工在水深没膝的河水里干活，劳动的时间无限延长。这里几乎天天发生劳工伤亡事故，日本鬼子为收买人心，经常召开劳工慰灵祭，在当地的协和会馆大办其事，表示追悼。记得有人作出了一付挽联：为

国宣劳活活饿死，一家老小真真可怜，横批是呜呼哀哉。

我所知道的军用劳工

邢士廉

关东军从1936年开始扩大国防建设，其计划为（1）选定建设地区；（2）动用劳工数目；（3）强征民地驱逐居民；（4）由伪政府供给大批器材。具体部署是，在延吉地区增建兵营；虎林建筑阵地和兵营；三江口建筑炮台、地道、兵营；在富锦五顶山利用山地建筑半要塞性阵地；黑河地区以孙吴为中心，在山神府、双桥建筑大规模的兵营、坑道，利用山地建设山洞储存库。

这条军事地带由黑河起，经孙吴至北安附近，沿江由呼玛、绥化、乌云、齐克、逊河各县到鹤岗，均为军事地带。由孙吴通往以上各县均有宽广的汽车道路，龙江地区增添兵营和飞机场、仓库；海拉尔地区增建兵营；东安地区增设兵营和阵地通各县军用公路；林口地区增设兵营和阵地、医院、地下储存库；牡丹江和佳木斯均增设兵营和阵地；公主岭建设了机械兵营，上述这些设施一直建设了8年之久。

在这些军事设施中，平均每日动用劳工35万人以上。每期劳工规定六个月，实际上没有期限。有的秘密工程完工之后，把从事该工程的劳工全部杀死。1943年，锦州1000多名劳工到这些工程中去，但是一直到1945年春也没有回来。锦州责任者询问关东军，回答说不知道；问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他说：“我也不知道，没经政府手续，大概是关东军直接办的。”后经家属百

般探询，确认被日本鬼子杀死无疑。

劳工供出

吉原圭一

1942年8月，我参加了抚顺县劳务科长佐藤幸喜召开的强制供出劳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警察署长、村长和劳务科职员。会后我奉科长命令，在警察署长协助下督促村长征用劳工，又以输送劳工负责人的身份，命令部下向关东军输送劳工。被我征用的劳工计1 200多人，送交牡丹江部队600名，关东军仓库约600名，强迫从事修建飞机场及仓库。

1942年8月10日，我在抚顺征用的劳工，送交齐齐哈尔军用50名，抚顺煤矿两次共600名，期限六个月。此外，征用劳工时，如村内摊派人数不足时，每名以1 200元至2 000元作为人员的补充，仅仅给抚顺煤矿两次征用劳工就榨取了12 000元。

1941年7月1日，我在奉天劳工办事处做注册工作，担任指纹班长职务。为防止劳动者的移动，指示下属采取了6 000名指纹，并将职业技术能力予以注册，发给劳工票及职能手册，劳工票每人3角，手册1元。自8月至11月15日，每天检查100至150名劳工票、职能手册，然后登记按指纹。

修正勤劳奉公法 加重奴役青年

金名世

1944年12月15日，我被任命为伪民生部大臣。翌年2月上旬，由民生部提出修正国民勤劳奉公法的法案。原来的国民勤劳奉公法是1942年公布的，规定国民勤劳奉公队服务的年限是一年，分为三年来完成，就是每年服四个月的劳动义务，三年服务完了。这个法令修正案是由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命令法制处伊藤博处长，与民生部次长关屋梯藏所起草的。起草后，经过次长会议通过这个修正法案，并于1945年2月上旬提交伪国务院会议，由我说明这个修正案的理。因为没有异议，乃由伪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提出表决通过。又于2月22日，在伪宫内府举行的伪参议府御前会议上，仍由我向伪皇帝溥仪说明修正理由后，则有参议丁超、井上忠也两人的质疑，当即由我答辩，没有疑问，由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询问其他参议有无意见，因为没有意见，即由臧式毅当面报告伪皇帝溥仪，提出表决一致通过，旋即发表敕令施行。关于说明修正案的理理由书，以及对各参议的质疑答辩，均由伪总务厅事前作成的。这是修正国民勤劳奉公法的经过大概情形。

所谓国民勤劳奉公队，就是伪满实行征兵后，对于征兵适龄的青年，因为征兵检查不合格，便强行组织起来服一定期间的劳役。原来规定服一年劳役分三年完成，国民勤劳奉公法修正案施行后，服劳役时间改为三年，分六年完成，每年六个月的义务奉公劳役，这就大大加重了对东北青年的奴役。管理国

民勤劳奉公队的机关，是民生部的外局，即国民勤劳奉公局。在这个修正法公布后，伪满政府机构改革，取消国民勤劳奉公局，成立国民勤劳奉公队总司令部，由勤劳部大臣于镜涛兼任总司令，次长半田敏治兼任副司令。

国民勤劳奉公队所担负的劳役，多数是为日寇开辟水田、修筑道路，也有的到各种工厂劳动。1943年和1944年，我任吉林省长时，吉林省的国民勤劳奉公队大约有7万人。1943年，伪满政府强行收买前郭旗土地，为日本开拓民修造水田，就是由吉林省征集的4万青年，编制国民勤劳奉公队到现地，用了2年时间修造水田。

1944年12月，我到民生部以后，知道1945年预定征集国民勤劳奉公队是30万人。几乎所有的人力，都被榨取征用了。

伪满劳工协会内幕及其罪行

袁铁风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于1936年成立伪财团法人满洲劳工协会。伪劳工协会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抓捕劳工，剥削压榨工人，使千百万劳动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暴行累累，令人发指。兹将所见所闻分述于下，以供读者从各方面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伪劳工协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东亚战争”前期成立起来的。成立伪劳工协会的目的有三：一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大量搜刮东北资源，为扩大侵略战争服务；二是掌握各种劳动力

情况，胁迫中国人从事各种建筑及施工；增加前后方实力，做垂死挣扎；三是加强对工人及城市贫民的控制与管理。

伪劳工协会于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筹备成立，总部设于新京（长春），各省均有支部。伪奉天省支部于1937年下半年开始筹备，1938年3、4月间正式成立，地址在八经路九纬路（原奉天财政厅长张振鹭住宅）。开始无分支机构，支部设事务科、登录股，有三四十人，其中日本人十余人。调任瓦房店伪警察署长为支部长。事务科管理财务、设备，负责对外联系，同时组织各市、县出張所代各厂矿招收工人。登录股派人到市内各厂矿为工人登录、照像、采取指纹、发放劳动票。

伪劳工协会奉天省支部，于1939年4月迁至现辽宁宾馆路北斜对过胡同二层红楼内。伪劳工协会占用南西两面，伪警察局指纹室在东面，后院亦为伪劳工协会占用，用作劳工登录往来聚散之地。奉天省支部除支部长以外，有主事一人，参事一人。下设事务、业务两科。事务科下设事务、财务、人事三个股；业务科下设业务、调整两个股。业务股职能为办理收发文件及档案整理、保管；调整股承受伪劳工协会总部下达省内应募劳工人数，下达各市、县出張所分担的劳工数字，以进行募集。当时奉天市是直辖市，机构组织、人事安排与其它市、县不同，奉天市出張所有参事、副参事各一人，设登录、募集、送金三个股。登录股下设指纹、劳动登录、职能登录三个系。各系职能如下：

指纹系：登录表填写后，另附十六开指纹用纸，纸上印有姓名、年龄、籍贯、单位、工种及两手十指平面与立体指纹栏。填写指纹用纸后，再依次摄影，采取每个劳工的指纹。采取指纹时，先将油墨涂于三寸宽一尺长三分厚的玻璃板上，令劳工以右手从拇指至无名指，由指甲一端作180°角滚至另一方；左手

亦复如是。这种指纹称为立体指纹。立体指纹中有涡旋纹、蹄状纹。两种指纹中又各分为A状B状（中国俗称斗、簸箕）。然后左右两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各取平面指纹。遇有六指或残指，则分别记入备考栏内。指纹用纸及照片经指纹系将劳动、职能登录分类后，交职能、劳动两系按各项填写，集总交业主持发劳工本人手中。职能、劳动登记表由登录股分档保管，所取的平面、立体指纹送伪警察局指纹室。指纹室是警察局直属机构，配有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指纹鉴定，分类编号，归档保管。指纹室内排列各种放大缩小仪器及药物备品。指纹档库中，类号繁冗，堆积如山，索引卡签，满装若干橱柜，可见指纹之多与人数之众。

劳动登录系：专门填写奉天市轻工行业的中国人技工、熟练工和一般工人劳动票。填写时，按登记表记载的姓名、年龄、原籍、单位、工种、工龄分类。劳动票用三寸宽、六寸长米红色带花纹三折式印刷的票面。中间记载姓名、年龄、籍贯、单位。上部贴一寸半身免冠像片（盖有钢印），右折按印就格式，填写工种分类、工龄等，左折记载应遵守各项。背面印制变更各项。

职能登录系：专为市内各厂矿中国人专业技工及从事重工业的熟练工、徒工、劳动工人填写职能登录证。职能登录证大小、颜色、样式与劳动票不同，为宽三寸、高四寸、右开册页式小册子，票面为浅灰色，册内白页第一页印有贴像片处，下有姓名、年龄、籍贯、单位、工龄等格式，最后一页印有变更年月日及遵守事项。

募集股设调整、募集两系，并分设募集所和劳工介绍所。各系、所职能如下：

调整系：办理各业主募集劳工申请手续和往来联系事项。施

工单位需用劳力必须向募集股提出申请，在募集申请书上填写施工项目、地点、募集人数、募集地点及募集日期，经募集股受理后，调整分配，避免密集招工，盲目招工或延长招工日期。

募集系：经调整系受理后，交股长批准，由募集系发给募集许可证，然后各业主可按指定地点、人数、日期招工。遇有厂矿业主委托募集股代行招工时，募集股照收募集手续费3元，并收募集费每人5元至10元。

募集所是奉天市出张所募集股直属机构，设在南站天泰棧内。所长一人，事务长一人，专为业主招工。招工吋，利用社会散在人员，称募集员，不是出张所在册人员。他们募集一名劳工，给伪币3元。招工吋招摇撞骗，一些穷苦劳动人民因生活所迫，遂应募充当劳工，被送到募集所，住在阴暗潮湿空房内，没有床，炕上仅铺有秫秸稻草，日仅两餐，窝头、卤咸菜。限制出入，有人看管，遇有病患，无人过问。劳工蓬头垢面，衣裳褴褛，形同乞丐。当招募足额，移交业主时，前后均有把头押运监视，坐闷罐车，凄惨情形，不忍目睹。

劳工介绍所设于老道口天桥西侧南斜坡上，专门供应各小业主劳动力，从事小型建筑、维修及临时勤杂搬运工作。失业工人与城市贫民为维持生活，每日早四五点钟即到劳工介绍所等待雇用。临时劳工工资每日伪币9角至1.2元之间。介绍所向业主收介绍费每人伪币3角。

送金股管理劳工汇款。伪满控制货币，防止金融外流。关内由于亦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民不聊生，许多劳工流入东北各地，有些人在工矿、建筑、军工部门当工人，有的当杂工和临时工，他们每月都要向关内汇款，以维持家中生活。但汇款金额严受控制，不能从银行直接汇款，必须由所在单位于月初按表格制定成册，向伪劳工协会奉天出张所送金股报告核对，进

行压缩与控制，不准超过月收入的50~70%。如发现冒报、假报月收入，则取消汇款，甚至按扰乱金融罪送有关单位处理。也有以核算失误、模糊不清、不符格式为由，拒绝受理，取消当月汇款。家在关内的工人回关里探亲或归乡，也必须经送金股发给旅行证及核准携带款数。在经过山海关时，又须经大东公司检查盘问，工人们几经刁难盘剥，携带现款已剩无几。在盘查中，言语不符、携带钱物不符、上下打点不足者，轻者遭斥责，重则遭踢打，甚至被扣留，没收旅行证，遣返原地。

伪劳工协会从支部长、主事、参事到科、股长均系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又来自警察署、工矿劳工部和退伍军人。省支部后期人员增至200余人。

各县募集、摊派劳工的情况是：由各县出張所与伪县公署根据伪国务院和伪劳工协会及伪省公署下达指标，由各县行政科，按区、村人口摊派。雇用的劳工费与募集费用均由各村分摊。劳工募集、摊派就绪后，由各县行政科造册移交伪劳工协会各县出張所，然后编成大、中、小队，实行连座、连环保。运送劳工时，由业主包租火车车箱，乘车途中，由各小队长看管，劳工不许擅自行动。伪满承包重点工程大部分是日本的大林、大同、大仓、清水、高岛、喜连川等八大组承揽。他们下设大把头一人，二把头若干人，二把头又分别用小把头（即三把头）若干人。在招工，由二把头引领小把头招募，二把头、三把头并从中盘剥、克扣劳工们的安家费、服装费、饮食费。被募集的劳工行动不得自由，处处受监视，每日粗食、咸菜，不得裹腹。运送时，由把头押运，与囚犯无异。被募集、摊派的劳工由于精神抑郁，过着非人生活，许多人病倒，死亡很多，甚至还有气息的也被扔到乱坟岗。

伪满后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清理“浮浪者”为名，清

洗无职业的中国人和乞丐。1938年至1939年春，伪满劳工协会配合各警察署，不分昼夜，几次搜索。那时东北劳苦大众由于谋生无路，十分困苦，有些人从关内逃荒到东北，沦落街头，有的沿街乞讨，夜间露宿在屋檐下或墙根下，他们都被作为清理对象。在北市场登瀛泉一带进行一次搜捕，在西关顺城街工夫市进行两次搜捕，都是由伪警察署便衣特务带领伪劳工协会人员进行的。据伪劳工协会临时抽调人员说，在清洗“浮浪者”当日，由庶务科通知搜捕人员，分批在夜间接指定时间参加紧急会议，伪警察署的人在会上只说今天有重要事情，并须严守秘密，有泄密者，按反满抗日论。然后由日本人带领而去。清理登瀛泉横街时，在街巷两头，十字路口，由伪劳工协会人员看守，由便衣特务搜查，被清理的人们闻讯分向四方奔逃。逃跑未果被抓回的，均遭毒打。被搜捕的人分别被装上大汽车，由便衣特务押送到南站旅店，然后分送工地，充当劳役。在工夫市清理“浮浪者”时，被清理的人每夜都轮流守望，一有动静，便互相传递。顺城街小店都靠城墙根，前后有院墙，遇有风声，可以立即从后门攀墙爬城，等到清理人员前来搜捕时，除病患者外，已无一人，室内仅存破衣乱草而已。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兵力分散，军需庞大，物质材料日渐枯竭，伪满境内人心浮动。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控制劳动力，又将伪劳工协会划归行政机构接管。在接管中，除对各级负责人另行安排外，各省支部及市、县出張所人员均归各省、市、县新成立的劳务科领导。劳务科与伪劳工协会大致相同，有登录、送金股，并设劳务股，取消了募集股和劳工介绍所。以后又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其从业人员中征调、补充兵源，在伪满境内搞“勤劳奉仕”，补充劳动力，将伪奉天市公署行政处劳务科改为勤劳奉仕处，增设动员科及

勤劳奉仕科，各县也不断增人与扩大组织机构。

总之，东北工人和广大劳苦群众的动向行踪都控制在伪劳工协会手中。伪劳工协会组织遍及伪满各省、市、县、区，残酷统治与压榨劳动人民，确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有力工具与帮凶。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日本侵略者推行
“人肉开采”政策大采炭
——13年害死矿工31200人，
掠走优质煤炭1000万吨

赵福瑞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丰富的资源、特别是煤炭资源早就垂涎三尺。因为煤炭、钢铁、石油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战略物资。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后，在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的统治下，设立了北票煤矿复兴委员会及北票煤矿临时营业局，后改为日伪合办的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由1936年4月并为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成立了冠山、台吉、三宝三个采炭所。

根据伪满洲国《产业开发计划》，从1937年着手大量开采掠夺北票煤炭。同年，在日本侵略者的亲自策划和监督下，开始大量开发三宝、台吉地区。开凿了三宝一、二坑和台吉一、二坑和后来的南山坑。所开凿的这些矿井，于1938年和1939年先后相继投产。到1940年北票煤炭年产量就超过了百万吨。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所需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的数量不断增加，日本侵略者便通过伪满洲政府炮制一个又一个的急需《物资动员计划》和《生产力扩充计划》，来推进它的战时生产。这些紧急动员计划发布后，那些在日伪统治下的煤矿工人的生活，就更加悲惨了。

首先，日本侵略者在满炭系统强制矿工开展采炭报国运动。规定劳工每月勤绩30个以上，达不到30个的不予开资。根据满炭的要求，日本侵略者和把头不顾工人死活，逼着工人延长劳动时间，一般一天都要在井下干14到16小时。据老工人周炳玉回忆：那年他在冠山矿采炭所一坑当劳工。一次在六百尺采煤，日本侵略者非逼他们一小班出300吨煤，他们20人拼死干16个小时，只出了240吨。升井后日本侵略者硬说没完成任务，不给吃饭票。台吉矿老工人王春说，他当劳工时，在台吉一坑采煤。一次，小班12个人，日本侵略者佐藤给下达采煤200车（每车1.2吨）的任务，如出不来就惩治。劳工们拼命干了一班，才出了130车。升井后，佐藤不仅不给打工票，每人还挨了好几个耳光子。老工人杨山回忆说：康德11年他在台吉一坑采煤，当二头子（组长）。那年9月他们在西部一斜坑采煤，日本侵略者池田大喊采炭报国，他说：今天一班230车的干活，磨洋工的不要，磨洋工统统不准升井。结果他们15个人干一班，连口气都没敢喘，到钟点才出了180车。鬼子池田火了，骂他们心坏啦，磨洋工，不叫他们升井，并又派人轮流监工，到底干了3个班。所以在劳工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日本鬼子真混蛋，三天两头大采炭，逼着咱们多挖煤，累得个个筋骨断。”

日本侵略者为了更多的掠夺煤炭，根本不考虑矿工的生命安危，采取掠夺式的开采政策，逼着工人乱采乱掘，实行“前进扒两帮，一捅冒落光”的采煤方法，强制工人冒险作业，以

人换煤，这就是惨绝人寰的“人肉开采”政策。那时井下经常发生片帮、冒顶、跑车、透水、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造成井下天天死人。“特殊工人”王殿荣被俘后，被押到台吉采炭所“报国寮”，第一天上班，他与3个难友被煤压在下面。有人要上去抢救，可是日本侵略者怕影响出煤，硬是不叫去救，结果3个人全被压死在井下了。仅据有关资料记载和部分老矿工回忆统计：从1933年至1945年，不到12年间就发生重大伤亡事故22例，其中死亡矿工485人。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北票煤矿期间，以各种名义抓骗劳工56 530多人。在不到13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用北票矿工的血汗，采掘并掠走了10 518 605吨优质煤炭。据不完全统计：从1933年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北票煤矿残害死矿工共31 200多人。如从1939年搞的所谓“采炭报国”运动算起，日本帝国主义每掠走1 000吨煤炭，就得有4名中国劳工被扔进“万人坑”。可见，炭矿也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刑场！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日本侵略者的人肉开采政策

苏德林 张玉昆 口述

张玉山 整理

苏德林说：1944年（伪满康德11年）农历八月到十一月底，北镇县长王玉甲第派我为大队长，去阜新平安矿带劳工下洞挖煤。因原来石敬臣率领劳工大队500人，早去阜新矿已经几个月了，他没管好，致使大部分劳工都逃跑了，待我去接替时，只剩有

180人。

这些劳工来自全县各村，多数是被摊派而来的，有势的人家不出劳工，有钱的人家雇劳工，没钱没势的穷人，才是被摊派或被雇去劳工的对象。不管你咋穷，就是家人吃不上饭，摊上就得去，不去或逃跑就算犯罪，抓、打、押、罚任凭处治。

我接替大队长以后，首先按传统惯例，带领全体劳工在坑口搞了一次祭老君庙的活动，又杀猪、又读祭文，所谓祈祷安全。这只不过是在心理上诱骗劳工们的一种麻醉剂，有意暗示事故出在谁的头上，下洞压死或碰伤致残，你都不要直接去怨当局与当权者关心不够，只有暗怨自己对“老君”这个“护命神”的不虔诚，以此来减轻当权者的罪责。

为了满足狂妄贪婪的野心，日寇不择手段地强力推行用人肉换取煤炭的“人肉开采”的反动政策，对劳工实行三班倒，置坑下水、火、风、毒、压等险情于不顾，强迫日夜下井挖煤，人死多少没关系，煤不可不挖。

结果，不几天，就因冒顶，把朝阳堡的一个姓王的劳工活活给砸死在井下（据知这人家非常穷困，是被雇而当劳工）。死了就算死了，任何安抚都没有。

平安矿上劳务分所，有个叫猪妖精的日人，对劳工是非常凶狠，动不动非打即骂，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因挂号的事，他狠狠打了一个小队长两个耳光。

有些小队长是为了发劳工苦难财不惜自己花钱上下走动“挖弄”来的。他们对劳工是经常打骂，公开向劳工们索要财物，什么坏事都干。其中，有一个小队长（北烧锅屯人）竟私自出卖劳工好几个。出卖一个劳工，顶少他要私得好处500元以上（所谓出卖劳工，就是他私得劳工一笔钱后，将他暗中放跑，然后公开向中队、大队一报告了事）。

此外，天天同我们劳工一起下洞挖煤的，还有几百人组成的所谓“劳光队”（是政治犯人的劳动组织），头头是日本人，领着他们天天下洞挖煤。走道时几个人用绳子串在一起，监管的特别严。亲眼见到，他们有因吃不饱饿死的；有因下洞挖煤累死的，还有被冒顶砸死的，更有直接被打死的。时常看见抬着几个死尸，从我们旁边走过，埋到南山坡去。

据目击者张玉昆见证：1944年（伪康德11年）阜新新丘矿下菜园子，由日本人用火车从关里抓来600多名所谓特殊工人，从车上下来，都是一串串全绑着。据知是日本兵坐着汽车，在山东、河北省农村，实行围屯抓青年，抓住一个绑一个，往车上一扔就拉来。到矿上立即把他们都圈到大房子里，周围全用电网围着，门口设几个荷枪实弹的岗哨，根本不准随便出入。下洞挖煤上、下班时，也有日本鬼子用枪看着。

当伪满洲国临近垮台时，这些特殊工人中，有一个带头的大汉，扛着铁锹，把600人队伍拉出来，领着队伍冲到门卫处，为首的工人，一个箭步冲上前，手起锹落，立即把门卫劈死，下了枪支拉着队伍就走了。

（摘自《北镇县文史资料》第八辑）

伪满四平省人民受奴役的实况

曲秉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后，为了榨取我国人民的劳力，生产侵略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和修筑军事工程，成立了大东公司（1941年废大东公司成立劳务兴国会）。由华北骗诱劳动人民前来伪满充当“劳工”从事奴隶劳动，并将伪满的学校教育以劳作做为重点，迫使学生服各种劳役。1938年12月公布了劳动统制法。1941年以后，伪满政府更变本加厉地制定和实行了“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国民勤劳奉公法”，并修改了劳动统制法等法令。伪满政府根据这些法令，强迫未征入国兵的青年编入“国民勤劳奉公队”，强迫每年服劳役4个月，共服3年劳役。同时又按伪行政系统，强迫居民充当“劳工”，即所谓供出劳工。1944年12月，伪满政府公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强迫伪中等学校和大学的学生服劳役。1945年2月，伪满政府修改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将“国民勤劳奉公队”每年服4个月的劳役延长为6个月。同年3月设立了专为办理奴役东北人民的伪满中央机关“国民勤劳部”。同年伪满政府公布了“国民年帐法”按“国民年帐”加强劳动统制。

二

伪满四平省在1941年设立的，它管辖有梨树、开原、昌图、

西安（今辽源市）、东丰、西丰、海龙、双辽、长岭等九县和四平市，共有人口300多万人。由于这些县市位于中满地带，土质肥沃，气候温和，人口比较稠密，日本侵略者称这个省为谷仓省、开拓省、劳工供出省。

我于1943年4月充任伪四平省省长，这年是伪满实行“国民勤劳奉公法”的头一年，又是伪满四平省执行其在东辽河治水名目掩盖下的开拓计划，在梨树县赫尔苏修拦洪大坝造水库，在其下游二龙山老公林子等地造农地开工的那年。我根据伪民生部的命令，命令所属各县市派出“国民勤劳奉公队”和供出“劳工”。

“国民勤劳奉公队”是根据壮丁名簿受“国兵检查”而未入伍者，都算是“国民勤劳奉公队”，一般称为“国兵漏”。“国民勤劳奉公队”的派出是省根据民生部的命令（1945年3月以后根据伪满国民勤劳部的命令）而命令所属县市派出指定的人数到指定的地点去服劳役。“国民勤劳奉公队”的编制是，40人为一小队，三个小队为一中队，一个中队126人，四个中队为一大队，一大队有600人到600人。派出人数随伪民生部的要求每年都不相同。1943年派出的人数是15000人，其中的一大部分是到梨树县东辽河地区为日本开拓民修拦洪大坝、造水库、造农地，其中的一小部分是到辽阳市修筑保护日本工厂的防水坝和梨树县杨木林子附近修哈大道路。

伪满居民从20岁到45岁的男子都有充当劳工的义务，每次服4个月或6个月的劳役。这是规定，实际上未满20岁的青年和45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有被强迫去或被抓去当“劳工”的，服役期间也是经常超过了4个月或6个月仍不放回来，有时竟延长一年以上的期限。“劳工”的供出是四平省根据伪民生部的命令（1945年3月以后根据伪勤劳部的命令）斟酌各县市的情况，

指定某县市供出一定人数的“劳工”，到一定地点去劳动。各伪县市公署则根据省的命令在其境内，按有劳动力的户口簿强派出人，不去不行。如本人因疾病或事故不能亲自去时，就必须花钱雇人替去，有花几百元或数千元伪币雇人代替的。伪县市公署由于伪省公署根据伪民生部的要求，一批又一批地命令供出“劳工”，因而在指派上发生困难，遂在县城内或市内大批抓人送出当“劳工”，致使一般青壮年人不敢到街上去，也有被抓去人的家庭由于失去劳动力而发生严重的生活困难。例如，在1944年的冬天，伪四平市内抓“劳工”，竟将在北沟居住的一位70多岁老太太的儿子抓去，这位老太太只有一个儿子靠蹬三轮车养活她，由于她的儿子被抓去，她立刻失去了生活的条件，她冒着风雪严寒到各处去哀求放回她的儿子，而其结果也是非去不行。

1943年6月，我偕同伪省公署民生厅动员科高科长和秘书官罗仙樵及伪协和会四平省本部庶务科长周博南到梨树县杨木林子附近修哈大道路的工地去视察。据说哈大道路是二条从哈尔滨到大连的输送道路，它是仿照法西斯德国的道路修的，这是它的一小段。我看见5公里多长的一块工地上修27米宽的道路，有梨树县和西安县的“国民勤劳奉公队”的1000多人，不停地在挖土挑土平地，累得各个满身都是汗，而持木棒监工的日本人还在督促他们快干快干。我看见他们都住在茅棚里，昨天下雨浸湿的被子、褥子都拿出来了，铺在草地上晒。他们吃的是每天三顿吃不饱的高粱米饭，没有菜。

7月我到梨树县赫尔苏参加拦洪大坝开工典礼，当典礼完毕后，听包头头樵原组的代表人（日本人）对工程的说明。了解到：在这个工地劳动的“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共有1万多人，他们是昼夜不停地劳动，仅经过1个月的时间即将溢

洪道开凿好。这溢洪道是由开凿岩石而成的，从一个山腰的东边一直开凿到山脚的西边。按工程进行的速度来说，是飞快的。福原组的代表人还引导我登上高峰观看“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的劳动情况。我看见：满山都是劳工在从事奴隶劳动，而这些劳工在日本监工的严苛督促下，用粗笨的铁镐挖土刨石，用土篮挑土运石不停地奔走着。在山脚的隐处有一排排、一幢幢的地窝棚，那就是这些劳工的住处。

8月，我偕同动员科高科长、罗仙樵秘书官到辽阳市修防水坝工地去视察。这防水坝是在辽阳城的东南方，长有15公里，在宣传上虽然说是为了都市的安全，防御太子河的泛滥，而实际是为了保护日本企业麻袋厂免受水患。参加这个工程劳动的有：伪奉天省各县的“国民勤劳奉公队”和伪四平省从长岭县、昌图县派去的2000名“国民勤劳奉公队”。工程是从现场取土筑起长坝，伪四平省“国民勤劳奉公队”负担修筑的那段，土质特别坚硬，挖也挖不动、刨也刨不动，工程的进度较伪奉天省的落后了很多。为此长岭县副县长日本人守田特来此地坐镇督促快干，决定要与奉天省同时完工。在工地上看不到一幢地窝棚，“国民勤劳奉公队”都睡在席棚里或是露宿在树下。也看不见有一眼比较完整的井，“国民勤劳奉公队”用泥土井的污水煮饭，饮泥土井的污水止渴，天气又炎热，并且时常阴雨连绵。正因为劳役沉重、管理严刻、卫生条件恶劣，在9月里就发生了痢疾病，到处都是病人。更由于没有医药，大批人死亡。伪四平省派去的2000名“国民勤劳奉公队”中死去了79人。

11月，动员科高科长到省长室对我说：他最近从密山回来，四平省供出的劳工，现在正在那修地下飞机场，就是先堆起土丘，在其上筑上层洋灰铁筋。然后将土挖出，在表面上再盖一层土。劳工们叫它“鸡窝”，一个“鸡窝”可隐蔽一架到二架飞

机。可是，劳工们到现在连棉衣服都没有穿上，每人都用破洋灰袋子纸绑在身上御寒，冻得他们浑身发抖。他和现地日本军负责人联络了一次，也没有得出结果。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眼看就要把人冻死了。

三

1944年，伪四平省派出的“国民勤劳奉公队”约2万人，其中的一大部分到梨树县东辽河地区为日本开拓民修拦洪大坝，造水库、造农地，其中一小部分到大连给日本人造木船和洋灰船，到鞍山日本人开办的工厂和沈阳日本兵工厂去做工。

这年伪四平省出“劳工”约3万人，其中的一大部分到伪黑省山神府地区给日本关东军修军用道路、兵舍、仓库、飞机场和梨树县东辽河地区给日本开拓民修拦洪大坝，造水库、造农地，其中的一小部分到西安煤矿给日本人挖煤和到日本人的企业从事奴隶劳动。

6月，我偕同动员科高科长、罗仙樵秘书官、伪协和会四平省本部庶务科长周博南到梨树县东辽河地区造农地的工地去视察。这个工地是从赫尔苏沿东辽河的南岸，经过二龙山到老公林子一带，长有20公里，我用了4天的时间看完了这块工地。在这块工地上从事劳动的“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共有2万多人，有的在挖掘大小的沟渠，有的在造农地，有的在修道路，有的在架桥梁。我为了督促他们多多劳动，给日本开拓民早日修完这个工程，我叫他们分别地集合在一个适当地点，我一次又一次地对他们讲话。我欺骗和麻痹他们说：“一个人能忍苦耐劳是成家立业的根本，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必然要倾家荡产。现在你们的劳动，就是对你们的很好锻炼。并且你们所做的工程是一举两得的工程，东辽河年年为患，沿岸居民受灾奇重，经

过这次的治水工作，不仅是水患永远消失，而且向来不能利用的土地都变成良田。你们担当这样重大意义的劳动是极其光荣的。你们要了解劳动的伟大意义，要了解这个工程的伟大意义，要积极劳动，尽快地完成这个工程。”我又到各处看了“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的劳动实际情况与他们的生活实际情况：我看见他们在早晨天将亮就出去劳动，挖土平地、挑土架桥和修道路等等，天黑才收工，平均每天做15小时左右的劳动；他们在劳动中，有监工的日本人站在旁边监视，强迫他们每天必须挖4立方米以上的土，他们如有做错了或者做少了、做慢了，就要遭受监工日本人的辱骂或者殴打。劳工们都赤着脊梁劳动，每人的皮肤都是黑黝黝的，好像在强烈的阳光下晒烈了地皮一样，两个肩膀都是红肿隆起，每人都是身体削瘦，累得满身是汗，呼呼地气喘。他们住的是用席子搭的地窝棚，睡在潮湿的土地上，在他们住处的四周都挖有又深又宽的壕沟。夜晚有人持棒监视，不许他们出入。他们吃的是每顿只给一个小苞米面饼子，或者是只给一小碗高粱米稀粥，经常不给菜吃，仅有时给一小碗无油少盐的菜汤。他们患病也没有医药，又不许回家医治。我所到之处都有病人躺在高粱地里或者躺在秫秸洞里呻吟。据说有时来了医生，其实那不是医生，那是医科学校还没有毕业的学生来实习，拿他们做实习的对象。

7月中旬，动员科高科长到省长室对我说：他最近去大连去看四平省派出的“国民勤劳公队”计有1000多人，其中木匠和泥瓦匠居多数。他们在日本人的指挥下造木船和洋灰船，都是做输送用的。木船和洋灰船怎能经得住海上的大风大浪呢？真是日暮穷途，有路就走。

9月，我同丁莘白动员科长、罗仙樵秘书官前往黑河。在黑河街的日本妓馆设盛宴招待道路部队长吉田中佐，当地日本军

部队长，伪黑河省长（日本人），伪黑河省次长（日本人）等以表示对他们的感谢。次日道路部长开汽车领我去看他们的道路。汽车从黑河街绕进街南方的山里，在山里修有与大江平行的道路。吉田指着道路对我说：“这就是四平省‘劳工’修的道路。”他还指着山谷隐处的房子和飞机场对我说：“那些兵舍、仓库和飞机场也有四平省‘劳工’修的。”汽车在道路上跑了1个多钟头，还没有看见道路的尽处。吉田对我说：“咱们回去吧！四平省‘劳工’的作业场所，离这还很远，不必去看了，工程快要完啦，他们过几天就回去了。”晚间吉田招待我们在山神府日本军人会馆吃晚饭作为回礼。我们回到旅馆后，丁萃白动员科长对我说：劳工在山里为日军修道路、修兵舍、修仓库和修飞机场，每天都吃不饱、活儿又累。天一亮就被赶出去做工，一直到天黑才收工，要是去的稍微晚一点，日本兵就用枪把子打和用脚踢。做工稍微慢一点或者休息时间稍微长一点，日本兵也过来打骂。有病不给治也不让休息，还得和平常一样去做工。自己穿来的衣服破了，也没有人过问，都得光着身子干活，冬天都披着破麻袋或是绑着破洋灰袋子纸御寒。

四

1945年，这年伪四平省派出的“国民勤劳奉公队”约2.5万人，其中的一大部分到梨树县东辽河地区给日本开拓民造农地和到海龙县给日本关东军修道路，其中的一小部分到大连给日本人造木船和洋灰船，到沈阳日本兵工厂生产军火，到鞍山日本人开办的工厂做工。这年伪四平省供出的“劳工”约2.5万人，其中的一大部分也是到梨树县东辽河地区给日本开拓民造农地和到海龙县给日本关东军修道路，其中的一小部分到西安煤矿给日本人挖煤和到日本人企业做工。

伪四平省根据伪满的教育方针，每年都随时迫使学生协助修道路、修拦洪大坝、造农地和服其他劳役，这都是以“勤劳奉公”的名义进行的。在学生“勤劳奉公令”公布以后，将学生服劳役作为必须尽的义务，强迫中等学校和大学的学生每年必须服3个月的劳役，按伪文教部指定的场所从事劳动。西安县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被伪文教部指定在西安煤矿服劳役，与普通工人一样劳动。

5月，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来到四平要到西安县去看学生服劳役的情况，我领他到西安县西安煤矿。西安煤矿的社长（日本人）又领他到泰信矿井的井口前，从里面叫出从事挖煤的西安县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50多人，站在我们的面前。他们各个头上都带着矿灯，面色苍白、满身体灰尘两脚泥土，身体还在发颤。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还麻痹他们说：“劳动是神圣的，你们在这劳动既能锻炼你们的身心，又能给国家生产煤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这种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你们必须听从煤矿当局的指挥好好劳动。”当天晚间西安煤矿社长在他的俱乐部设盛宴招待卢元善和我。在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离开西安县的时候，伪西安县公署为了对他表示敬意，特送给他一筐鸡蛋。

6日，我偕同常守陈民生厅长、丁莘自动员科长、罗仙樵秘书官到梨树县东辽河地区农地造成工地去视察。在工地从事劳动的“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共有2.5万多人。我和去年一样从工地的西头一直看到东头，关于“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遭受奴役和虐待的严重情况与去年所看见的相同。

五

伪四平省自从我去当省长后，从1943年4月到1945年8月，以“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名目奴役的人民就有15.5

万多人，由于残酷地虐待，苛重的奴隶劳动，卫生条件恶劣，没有医药，因而“国民勤劳奉公队”的死亡率高达2%，劳工的死亡率高达4%，劳工死后，按伪满政府规定由使用业主给很少的钱，这笔钱在当时连半头猪都买不下来。可见，日本侵略者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各伪县市公署为了邀买人心，在每年冬季都为当年死去的“劳工”开追悼会，西丰县公署更为死去的“劳工”修了一个“劳工碑”，而由于派出“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使多少父母失去了儿子、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多少儿子失去了父亲，多少美好家庭被破坏。

劳工血泪

张宝玉

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战争和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对我国沦陷区的经济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1936年，日本侵略者就开始进行浑江水利勘测；1941年1月，通过“佐藤株式会社”等殖民机构，垄断了浑江的水利资源，在桓仁县城北的牯牛哨修建水电站。

电站开工之后，日本侵略者实行了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他们以骗拉、强征和抓捕等手段，从各地掳掠大批劳工到电站从事沉重的劳役。到1942年，就掳掠劳工2000多人。这些劳工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下，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和灾难。

我是1943年被抓到桓仁电站当劳工的，住在刘家沟那阴暗的水泥房里。我们每天每人只配给9两粮，大部分是橡子面，吃起来又苦又涩。我们小队60多人，担任从江心往10米高的坝基

上抬土，每人每天的任务是3立方米。一天累得直打晃，稍微慢一点，被工头发现就拿拳头踢，还要罚跪。有个叫谢景昌的勤劳奉仕大队长，劳工们给他起个外号叫“谢扒皮”，他一到工地就横长鼻子竖长眼，非打即骂。我们大队的几百名劳工，都挨过他的打。

白天干10多个小时的重活儿，晚上睡在又潮又冷的劳工房里。夏天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破被子整天湿漉漉的，很多劳工生了疥疮。到了冬天更难熬，床铺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无奈几个人缩成一团，互相靠身体来取暖。屋子里，水盆中的水都冻鼓了。每个人都冻坏了手脚，严寒严重的威胁着劳工的生命。

有一天轮到我站岗，一个姓王的劳工，因受不了日本鬼子和工头的毒打，借外出小便的机会，光着屁股逃跑了。第二天，工头发现少了一个人，硬说是我有意放走的。把我带到大队部里，全身上下剥个溜溜光，反绑在一条长凳上，先往我的鼻孔里灌凉水，然后用皮带抽打，折磨得我死去活来。我死活不认帐，最后把我放了。日本人见我遍体鳞伤，便把我送进所谓的医院，一个医生端来一大碗黄色的苦水逼着我喝，我忍着苦涩，勉强喝了下去，头又胀又疼。打那以后，劳工有病，谁也不肯上医院了。

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把劳工当人看待，劳工们过的是牛马生活，伤亡事故时有发生。

有一次，围堰浇注混凝土，有2名劳工失脚掉到下面。日本鬼子站在旁边若无其事，无动于衷，根本没拿当回事儿，不但不管，反而强令继续浇注。

还有一天上午，从围堰外用卷扬机绞斗车时，钢丝绳断了，站在车上的8名劳工全都跌落下来，当时摔死4名，幸存者折胳膊

膊断腿全是伤。日本鬼子却以此取乐，连说：“好玩，好玩。”

我在桓仁电站整整干了两年劳工活儿，被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了，回家后躺在炕上一年多，总算死里逃生过来了。一提起这两年的经历，浑身上下直打颤。那是两年地狱般的生活啊！

当时劳工们的斗争是以“磨洋工”的方式对付日本侵略者。到“八·一五”光复，电站修了五年，仅仅完成了浑江右岸的围堰工程。

劳工的血泪已经成为历史。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珍惜今天。

（摘自《桓仁文史资料》）

丰满劳工的血泪控诉

尸骨堆成的大坝

刁岐山口述

丰满大坝于1937年开工。在这之前，日本人就到丰满进行勘探，强占耕地。我们家当时有几亩地被他们占去了，一文钱也没给。我们当地有不少农民都因无活可干，被迫当了劳工。我亲历了劳工的苦难，亲眼看到无数的劳工惨遭杀害，死的人太多了，大坝简直是用中国劳工的尸骨堆起来的。

那时冬天天气很冷，气温经常达到零下40多摄氏度。丰满的风又大（大小丰满过去有大小风门之称），真是够人受的。那

时丰满的劳工多数是从关内外被抓来和被骗来的。我当时听关里来的劳工说，把头在招工时说，到吉林丰满去当工人可好了，尽吃大米白面，住的是洋房，还发给工人服装。可是，当劳工来到这冰封雪飘的丰满，才知道是上当受骗了，吃的是杂合面、橡子面，住的是席棚子。我记得大东公司只发过一件大坎肩，别的什么也没发过。

劳工们在江坝上推轱辘马子，北风呼呼地响，冻得人人手脚麻木，不听使唤，脚踏着枕木，有时推着推着就连人带车掉到江里，许多劳工被淹死。

冬季里劳工们挖土方，为了避风就沿着一定的深度往里挖，我们把这种挖法叫“掏窑”。由于坑越挖越大，进到土坑里的劳工就越来越多。有一天，塌方了，100多人捂在土坑里，小鬼子知道了没让人救，这些人全被压死了。

小鬼子最阴损，每天都是中午开饭时间，不等劳工完全从工地上走净，就逼着炮手点炮崩石头，一放就是百八十炮，飞到高空的石头像冰雹一样往下落，有的劳工被砸死。有一天中午，一个劳工正在吃窝头，突然从空中飞来一块石头，落在他的脑袋上，立刻就被砸死了，嘴里还含着窝头，手里还攥着吃剩下的半个窝头。这情景我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日本鬼子多么凶狠，它给我们劳工带来多么深重的苦难！

推轱辘马子是很危险的，由于坡度大，又没有任何安全设施，每天都有几名劳工被车碰死碰伤。记得有一次，牵引轱辘马子的钢丝绳断了，轱辘马子折着个向坡下翻滚，一个接着一个。被撞死的、砸死的劳工黑压压的一片，这一次就死了五六十人。见到这情景的劳工都掉下了悲愤的眼泪。

劳工们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就逃跑，有的只身逃跑，有的结伙逃跑。小鬼子为了震慑劳工、防止逃跑，一方面加强看

守，一方面残酷镇压。逃跑的劳工一旦被抓回来，就用镐把打死，并让没跑的劳工排着队观看。有一次跑了100多人，鬼子知道后，立即派出警备队骑马追赶。劳工们到江边无路可逃，被迫下江，淹死不少，逃出去的没有几个。被抓回来的有二三十人，全部被鬼子、警备队用镐把当众打死，惨不忍睹。

日本鬼子根本不把劳工当人看待，张口就骂，举手就打。他们把劳工叫做“苦力”。有人说，日本鬼子整死个劳工就像杀个小鸡。依我看，比杀个小鸡还不在意，就像死个麻雀。比如说，劳工干活累了，稍有站立，被鬼子、监工的看见，轻则打几个耳光，重则一抬脚就把劳工从坝上踢到江里淹死，或者一棒子打死。

丰满有个“万人坑”，究竟当时丰满劳工死了多少，我看不止1万。当时我们每天看见拉到万人坑的劳工尸体有十个八个的。那时劳工被钉子扎坏了脚，一无医，二无药，还得干苦力，脚连肿带烂，用不了几天，这人就完了。

冬天，劳工们排着队上工，走着走着，有的就被冻死在路上。有人说，被冻死的劳工脸是“乐”的，怎么会“乐”呢？就是人在冻死前难受，咧着嘴好像在笑。到了夏季，工棚子附近全是茅坑，苍蝇叮，蚊子咬，跳蚤多。一进工棚子，就会有几十个跳蚤叮咬在人的双腿上，用手一拍，就会打死几只，真要人命。在这样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劳工患病的非常多，伤寒蔓延，瘟疫流行，劳工大量死亡。劳工的尸体被拉到“万人坑”，狗就去吃死人。时间长了，狗的眼睛变红了，也不回家了。这些野狗和狼一样厉害。我听王庆的父亲说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个从关里来的中年妇女，到丰满来寻找丈夫。后来她听人说，她的丈夫已经死了，被扔进了“万人坑”。她就到万人坑去哭丈夫，被好心的王大爷劝到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她又到万人坑去哭，

哭昏过去了。后来有人看到这个妇女穿的鞋和被撕破的衣服，知道她是被野狗吃了。

鬼子火烧工棚

郭庆祥口述

我是1941年12月因山东老家无法生活来到丰满的，要了9个月的饭，后托人到丰满江东拌合楼当“博役”（搅拌混凝土的勤杂工）。1943年又到大拌合楼当清扫工，每月只给一元八角钱，生活别提有多苦了。

1943年春天跑桃花水时，劳工们因过度劳累，饥寒交迫，得病的很多。我们拌合楼对面（隔一条道）那栋劳工棚子前，有一天清早突然开来了几辆汽车，车上有鬼子和警备队员三十来人。他们一下车就往工棚子上烧汽油，点了火，一共点了两栋工棚子，火焰冲天，顿时传出了劳工们撕裂心肺的惨叫声……有的劳工拼命往外冲，刚到门口就被鬼子、警备队这群魔鬼开枪打死，结果，这两栋工棚子里的160名劳工全被烧死了。鬼子烧死劳工的借口是劳工得了传染病。看！日本鬼子多么惨无人道，比蛇蝎还要狠毒！

得病劳工活活被扔进“万人坑”

李长松口述

我的老家在上海，早年丧母。日寇侵占上海时，我和父亲在逃难中被人冲散，父亲不知下落。从那时开始，我就过着流浪生活。

1939年我来到丰满当了劳工，被编到第二十七栋四班。干活是挖土方，有时推轱辘马子，或到江西去运东西。

当时由于日本鬼子、把头对劳工的非人折磨，劳工死的太

多了，每天都死人。有个叫“杨四爷”的专门管死人的事。这个杨四爷为人十分歹毒，他见到劳工躺在炕上不能动弹，不管是死是活就往外拖。有个劳工患病躺在炕上，看见杨四爷来了，苦苦哀求说：“杨四爷，我还有气呀！我还能活，你可千万别把我弄出去呀！”可是这个灭绝人性的杨四爷只当没听见一样，把这个劳工拖出去，活活扔进万人坑里去了，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

1941年我也得了伤寒病，一病就起不来炕。我害怕极了，唯恐被杨四爷看见，若是让他看见，就非没命不可，幸亏有位厨房大师傅搭救，把我藏到他的房子里。后来我的病慢慢好了，我算是拣了一条命。

有一次我们用草袋子抬铁，走到江坝上，大伙说歇一会儿。刚歇下，突然有个鬼子走过来。一个劳工低声喊：“不好，鬼子来了！”有个年龄小的劳工哈腰抬，没抬起来，日本鬼子看见了，抬腿就是一脚，给踢到江里去了。日本鬼根本不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

大坝合拢，劳工被淹

李横新口述

和我们在一起干活的有个劳工叫翟明初，浙江省衢县人。他亲自对我说过，大坝合拢时，淹死劳工200多人。

大坝合拢时，水流特别急，鬼子、监工的让一帮劳工拿木板和棉被堵住江流，然后浇筑混凝土。截断江流后，水面不断上涨，水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劳工们被迫拼命地支撑着木板，不停地用棉被堵着板缝。不一会儿，只听得“轰”地一声响，水把木板全部冲开，劳工们顺江流被卷进了漩涡，这一次就淹死劳工200多人。

死难劳工数以万计

王庆口述

我叫王庆，今年74岁。我是丰满的老户，伪满时期就住在现在丰满陵园（万人坑）的旁边。在修丰满电站以前，那儿没有什么“万人坑”，就住我们一户。

现在大伙都说“丰满万人坑”，那儿究竟有多少劳工的尸骨，我是说不出准数的，反正劳工死的是太多了。

修建丰满电站初期，把死了的劳工都送到“尖山子”根的水沟里。由于这里离大坝较近，小鬼子、把头嫌有死尸味，后来就让人往“万人坑”这边送。

死了的劳工，开始还给一个薄板棺材，后来死的劳工多了，就把劳工的尸体装到车上，一车一车往万人坑里扔。冬天冰雪封地时，就用爬犁拉，无论是用车拉还是用爬犁拉，都经过我家门口，每天都有劳工的尸体扔进万人坑，少则五、六人，多则几十人，没有一天不扔的。记得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九，有一栋工棚子着火，鬼子怕有人乘机逃跑，把工棚子封死，不让人去救，结果不少劳工被烧死了。第二天正是大年三十，往万人坑拉被火烧死的劳工尸体共装了三爬犁，少说也有六、七十人。丰满劳工天天有死的，大坝工程干了五、六年，死的劳工有多少，算算就知道了。

万人坑里劳工的尸骨有好几层，现在丰满陵园院内展出的尸骨是从我告诉的地点挖出来的，这些尸骨仅是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劳工尸骨被埋在丰满一带。

（齐洪时整理，吉林市郊区政协供稿）

日伪残害抚顺人民的“勤劳奉公”

刘寒松

“七·七”事变后，日帝加紧侵略中国，妄图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由于战争的需要，经济上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政策。在东北大肆修筑公路、桥梁和其它军事工程，开垦荒地，种植粮油作物。因此，需要大批劳动力，为了强迫中国人民充当苦力，日帝有计划、有组织地成立了所谓“勤劳奉公队”，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的压榨和屠杀。

国民勤劳奉公制度，是伪满协和会骨干分子半田敏治（1945年日本投降时任伪满政府勤劳奉公部次长）从法西斯德国学来的。他于1938年去德国考察法西斯青少年的学习与劳动，回到日本后，立即向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少壮派军国主义的首要人物汇报，重点要向德国学习实行“国民勤劳奉公制度”。1940年半田敏治来到我国东北，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建议，要在伪满洲国全国范围内建立类似德国式的“国民勤劳奉公制度”。同年伪满实行征兵制，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适龄青年30多万人，而每年被征入伍者仅3万人，被征而不合格者当时叫“国兵漏”，约有27万人。半田认为这是一大批最好的劳动力。对“国兵漏”实行三年为期的义务劳动，组织成为半军事化的劳动大军——“勤劳奉公队”。首先在黑龙江地区试行。日伪于1941年在哈尔滨正式成立国民勤劳奉公队。1942年10月26日，伪满政府正式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局官制》，又在民生部设置国民勤劳奉公局。1942年11月18日又公布《国民勤劳奉公法》和

《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至此，所谓国民勤劳奉公制度在日伪时期正式确立。抚顺也就随着相应的建立起来了这种制度。在伪抚顺市公署增设动员科下设勤劳奉公股，又成立了勤劳奉公大队、中队、小队。

日伪依据《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和《国民勤劳奉公法》宣布“国民皆劳”，又按《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是年龄达到20岁到23岁的青年男子，不被征为国兵者，都有义务参加勤劳奉公队，精神异常者和身体虚弱者除外。”1945年3月11日，该法又修改为年龄延长至30岁。凡是被强迫征集者必须服役，服役时间每年4个月，3年期为12个月，必要时还要延长。

国民勤劳奉公制度不仅施用于未被强制征集的“国兵漏”，而且在大专院校、中小学校的青少年学生中也组成了勤劳奉公队，强迫他们勤劳奉仕（“奉仕”是日本的汉字，意思就是“服务”、“效劳”）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役。1942年12月23日，伪满政府公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规定大学和相当于大学的教育单位的在校生，实行“勤劳奉公”，每年组织勤劳奉公队，为期1个月至45天。无正当理由而不能完成规定的勤劳奉公劳役者，不许毕业（卒业）。1943年到1945年，伪满青年学生几乎是常年被迫担负劳役。笔者于1943年春，在抚顺市中和国民优级学校读书时，由副校长久住修三（日本人）带领200多人，被强迫征集到抚顺市瓢屯（今望花区高湾农场附近）去开垦荒地，种植蓖麻（用蓖麻籽生产空军用的润滑油）。又于1944年在奉天省立第四国民高等学校读书时，由日本老师朝香带领100多名学生到沈阳铁西机场去勤劳奉仕，强迫学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日伪时期，青年学生常常被迫停课数月，送到边境服苦役。日本在抚顺东洲建东制油（今石油二厂）时，强制征集抚顺勤劳奉仕队队员和青年学生去挖土方，翻干子石（油母页

岩)，抬大筐、挑土篮。

抚顺的勤劳奉公队在日伪时期与东北各地的情况大体相同。伪满抚顺市公署市长俊藤英男兼任抚顺市勤劳奉公队大队长（内部也叫司令），1945年泽田市长兼任，笔者的同学宫风斌的哥哥宫××曾任中队长，下设若干小队，小队下设班。在伪满抚顺市公署设立动员科专管勤劳奉公队的行政事宜。

伪满抚顺市协和会也设立了勤劳奉公班，协助伪政府作思想动员工作，从思想上奴役迫害勤劳奉公队员。据伪满曾任过抚顺市协和会青少年训练所教官的王有（现名王泽清，今抚顺市二十中学退休教师）回忆：“我曾在伪满抚顺市协和会青年训练所任过职，协和会确有勤劳奉仕班这个组织，协助抚顺市公署动员科动员（强制征集之意）‘国兵漏’和青年去充当勤劳奉仕队员，谈什么当队员光荣，是日满协和的友好行动等诱骗的花言巧语。”

抚顺的勤劳奉公队除在抚顺东制油（今石油二厂）、西制油（今石油一厂）、抚顺轻金属（今铝厂）、抚顺液化厂（今抚顺石油三厂）、日本“九·一八”部队仓库（今三二五库）、抚顺矿药厂（今抚顺十一厂）、瓢屯开拓团（今高湾农场）以及抚顺洋灰窑（今抚顺水泥厂）等地进行繁重劳动外，还有被强迫征集到北满边境修筑所谓国防线的，也有的被送到距哈尔滨市20公里的平房一带，给日本七三一部队（细菌试验部队）和距长春10公里的孟家屯第一〇〇部队（细菌试验部队）充当劳工的。人们在日本关东军刺刀下负担着沉重的劳役，去者多，回者少。据《满洲国史》记载：“1944年的劳动力动员计划是331.1万人，其中勤劳奉公队23.8万人。”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

浑江大栗子铁矿劳工的生活

李权洙

凡是经历过日伪统治时期的人，一提起当劳工，至今还毛骨悚然，那真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生活。

劳工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强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而在我国东北地区所采取的血腥政策之一。即所谓“全民皆劳”的强制劳动制，造成了白骨成山、血泪成河的历史悲剧，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施行劳工制的办法是：一“派”；二“抓”，一概采用法西斯暴力。所谓“派”就是省、县、村、屯层层下达名额指标，最后按屯劳力数强行摊派到老百姓的头上。长白县施行劳工制是从1942年7月开始的，美其名曰组织“增产队”，大屯摊派3至5名，小屯1至2名，全县总额为200余名。其中，朝鲜族占40%左右。当然，这种有去难回的死囚生活，谁也不想去尝试。但是，临到头上，不得不去，不去就得出现金雇人，穷人哪有现金可出呢？头一年规定，每户交纳40元，第二年规定60元，第三年80元。这种年年递增交纳现金的办法当然对富人有利，至于那些饥寒交迫，讨借无门的贫穷农民，除被逼当劳工外，别无他路。每户出的钱，在名义上补助劳工家属的生活费。但是，多数被污吏私吞，落到劳工家属名下的寥寥无几。所以说“一人当劳工，全家进火坑”。更有甚者，有人竟搭上了命，却连一文钱也没得到。例如：十六道沟屯的贫苦户金应植，当长工一年挣60元钱，被雇去当为期9个月的劳工，商定期满后给90元

钱，结果，期未满，被折磨死在临江大栗子铁矿。

“抓”的对象，就是所谓的无正当职业的“浮浪者”。其实是一种极其野蛮的绑架行为。“欲治其罪、何患无词？”所以，老百姓中的青壮年为“抓劳工”整日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即使这样，也逃脱不了当劳工的命运。张金德说：“我住在半截沟屯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寒，无地可租，干修道等杂工养家糊口，竟被屯长李柱鹤暗中定为抓劳工的对象。李以查良民证为名，拿去良民证之后，无理地没收了。硬说我是无正当职业的‘浮浪者’，强行抓去当了劳工。进矿后不久得了病，没有朋友的关心照料，差点就没有命了。”

长白县的劳工全去临江大栗子铁矿当苦力。为了加强管理，防止逃跑，进矿之前在县里统一编队，任命头目，实行法西斯军事化管理。长白县劳工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六个小队。大队长：白凤超、于光顺；副大队长：沈相、周仁；中队长为冷德金、许得等人。经过训练之后，在头目的严密的看管之下，从长白县城出发，徒步250公里去临江大栗子铁矿。

矿山就像一座戒备森严阴森恐怖的大监狱。劳工们一进矿大门，第一道手续，先交出良民证。从而失掉了亡国奴的一点所谓的“人身自由”。之后，每人发给一套紫黄色的劳工服，一双红胶底的劳工鞋和两个劳工饭碗。以小队为单位安排宿舍。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大事小情要报告，出入大门必须有通行证，没有通行证不准出门。从此之后，一群群抛妻弃子、背井离乡的劳工们，就成了毫无人身保障的囚犯。

劳工宿舍：劳工的住宿条件很差，类似牲口圈。当过两年劳工的金相润老人说：我们劳工住的宿舍是不避风寒的茅草屋，均是大屋子对面炕，一间屋里挤四五十人，睡觉不能翻身，活动无法迈步。刚去时，屋里还有个炕，但炕破碎之后，就再也

不见炕的影子，一律铺上稻草，身体脏污，无处洗澡，无衣更换。派工的有一点小行李，但被抓去的劳工连个破行李也没有，就天天钻稻草里睡。屋里汗臭、脚臭、煤烟臭能把人熏昏。炕上臭虫、虱子、跳蚤能把人咬伤。这儿哪里是人间生活，简直是地狱。虽然戒备森严，但有逃跑者不断出现。为了防止逃跑，就寝前点名之后，一律将衣服脱光，装入编号的网兜里，在队部里保管，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再发给。在伪满时期，因缺布能穿裤衩的人很少。按着日本人的习惯带兜裆布，对劳工来说，带兜裆布的也不多。一到晚间都变成了裸体，似原始人的人群。

劳工的饮食：劳工吃的主食是粗苞米面，带一点霉烂的小米。名义上每人每天定量为一斤二两。但层层克扣之后，实际上连一斤也不够。金相润说：“早饭是二两稀面子粥，中午和晚饭是吃半生不熟的四两窝窝头，一个窝窝头，一割两半，一人一半。副食是清水萝卜条、白菜汤。吃完之后，碗底泥沙足有半寸厚，这就是劳工的伙食。这点粗饭淡菜，不出工不给，病号不给，硬逼着出工。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劳工想的不是吃好而是吃饱，但没吃过一顿饱饭。饿肚子是最大的痛苦。有时候，饿了就睡不着觉偷偷地起床，摸到脏水缸去，捞一点什么可吃的东西，但捞不到饭粒或菜叶子。如今回忆起来，不知是怎么过的。”

劳工的衣服：一套劳工服，很快就穿破了，所有劳工几乎个个都是赤身裸体，像一群叫花子。初相亨说：“劳工服是更生布，多数是无袖的坎肩衩裤，这也不是一人一套，数量不足不好分配，因此采取抓阄。有个姓李的劳工，是个病号，他听说要发坎肩，盼望得到一件便出工，结果，第二天死了。衣服破了既无线缝，又无布补，只能用线麻连一连，扎一扎；鞋坏了只好光着脚下井干活。人毕竟不是牲畜，既有羞耻又要御寒，劳

工人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偷偷地上‘万灵塔’从死人身上扒衣服穿，他们的生活命运是何等悲惨呀！”

劳工的劳作：劳工们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下煎熬，然而却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所有的劳工都在暗无天日的井下劳动，打眼放炮，危险性多，经常发生死亡事故。一天三班倒，一班8个小时，一年365天，根本没有节假日。井下没有电灯，没有安全设备，到处黑窟窿洞，到处阴冷逼人，像一座充满恐怖的大墓穴。劳工们就在这个“阴曹地府”里昼夜挣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腰累弯了、脚累肿了，手脚磨烂了，身上的油被熬干了，连身上的劳工服也被赤铁矿锈染得更红了。劳工们个个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然而，等待他们的就是工头的打骂。

工头是日伪政权的忠实走狗，他们既是些吸血鬼，又是些刽子手。金相润说：他们随便打骂劳工，出工集合，点名报数，下井干活，收工站队，甚至起床就寝、大小便都是他们大发淫威的时刻。他们的棍棒经常往劳工的身上抡、头上刨，轻者遍体是伤，头破血流，重者心伤体残，昏死过去。中队长冷德全就是个心黑手狠的家伙。专用镐把打头部，一打就昏倒在地。中队长许律经常向疲劳过度死睡在地上的劳工脸上撒尿刺激苏醒。但他们是头目，大权握手中只能怀恨在心，无法吐口，在棍棒的压力下“忍耐”，避免眼前吃亏。

劳工最大的危险是生病。在悲惨生活和繁重劳动的折磨下，劳工们一个个精疲力尽，骨瘦如柴，生病率不断增高。病会给劳工们带来更大的厄运，无疑等于被判为死刑。金相润说：无论得了什么病，统统定名为传染病，一律关进“病号房”。病号房也是大坑，对面屋，周围拉上草绳，把人给隔离起来，治病不分病情，统一吃大锅药，熬上一锅药（鬼知道都是些什么

药)大家都来吃,一人一碗,像分菜汤那样。所以,进了病号房,很少有人能逃生。由于病号多,天天有死人,有时一天抬出八九口,没有棺材,人死后只有四页破板裹着尸体,用铁丝捆三道棺抬到“万灵塔”一扔就算了事。最令人不忍心的是有的患者被扔到“万灵塔”后,还活着,真叫人寒心。见闻这些,感到我们都是苦命相连的,他们的今日,也许是我们的明日。“万灵塔”在离矿山四五公里的一个阳山坡上,天长日久堆成了白骨山,葬的人数太多,人们起名为万灵塔。1945年春,曾发生一场荒火,将未腐烂的尸体烧成奇形怪状,令人毛骨悚然,目不忍睹。

(根据当年劳工金相润、张金德、初来金、初相亨等人口述整理,摘自《浑江文史资料》第六辑)

日伪统治时期

七道沟铁矿工人的苦难

魏春德等口述 于开圻、刘荒、辛愚圣整理

七道沟铁矿位于通化县东南部七道沟镇境内。“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日本侵略者就开始对七道沟铁矿进行调查和开采勘测。1938年9月14日在通化二道江街成立了“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下设大栗子、七道沟采矿所。1940年,七道沟铁矿正式开采。到1945年8月东北光复时,日本侵略者从七道沟铁矿共掠夺矿石135.8万多吨,留下的却是三个万人坑,埋葬着1.5万多具中国矿工的尸骨。解放后,在镇区西南侧的矿工墓群的中央,建立了一座“日伪统治时期七道沟铁矿死难矿工纪念碑”。

一、矿工的来源

七道沟铁矿矿工的来源主要有四个途径。

其一：骗招。汉奸把头 and 七道沟采矿所签订合同，用欺骗的手段，招收工人，从中渔利。他们骗招的对象主要是沦陷区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以山东为最多，河北、河南次之。

老矿工刘宪明回忆他全家被骗的经过时说：“我老家是山东即墨。日本鬼子进占山东，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没法生活，我父亲被国民党抓了兵，我母亲领着我们兄弟姊妹无依无靠。我父亲挂记着我们的生活，不愿意干，几次逃跑，抓回去就打，被打成了残废放回家。父亲伤好后领着全家到了青岛，父亲和大哥进工厂做工，人口多，挣的少，连肚子都吃不饱，父亲和两个妹妹死在青岛。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遇到了七道沟矿‘盛景奎组’去招工。招工的叫傅学敏，他说七道沟矿好，活不累，一天干不上半天活，吃的是大米白面，住的是洋楼，一天挣两元钱。愿意干的常干，不愿意干的6个月就能发财回家。听了他的话，觉得生活有了出路，我大哥报了名。这一批共有42个人。报名后的头几天确实挺好，顿顿吃细粮。到了大连就变了样，吃的是苞米面窝窝头。从大连上火车坐的是闷罐，人和行李分车装，车上了锁。到了七道沟以后，才知道是进了人间地狱。”

其二：派、抓。当地的居民对七道沟矿工的苦难生活是耳闻目睹，谁也不愿意去矿山卖命，日本人就让伪满政权通过各村、屯强行摊派劳工。每几户要一名，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有钱人家出钱雇人，没钱的穷人就得去跳火坑。日本人还利用警察到各地去抓“浮浪”，把一些无业的穷苦人抓到矿山当劳工。

其三：是把在前线俘虏的抗日武装人员和大批的爱国人士送来七道沟矿，编成“辅导工人队”。“辅导工人”的住处围了

两层铁丝网，行动没有自由，成年累月地服劳役。

其四：“勤劳奉仕队”。“勤劳奉仕队”是由检查“国兵”不合格的适龄青年编成的，组织、行动军事化。进行为期三年的无偿劳役。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加快了对七道沟矿的掠夺步伐。伪满后期矿里成立了两个“增产大队”：“通化县增产大队”和“辑安（今集安）县增产大队”。两个增产大队的劳工都是两个县内被抓硬派的穷苦人民。

二、政治上的迫害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保证对七道沟铁矿资源的掠夺和加强对矿工的统治，在七道沟矿区成立了重重叠叠的统治机构。

矿山警备队：该队由“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直接领导，负责矿山治安。每天派便衣到矿区附近的六道沟、小南岔、郝家街（今东胜）、八道沟等地活动，经常在火车站等公共场所抓捕工人，对被抓捕的工人以“逃跑犯”的罪名吊打非刑。

七道沟警察分所：是六道沟警察署的派出机构，负责地方治安，也是配合日本侵略者压迫矿工的工具。矿工姜大成的老母亲病得很重，家里捎来信，他想请假回家看看老母亲。把头不给假，他偷着走了，走到五道江被警察抓回来送到矿里，在400多名工人面前将姜大成活活打死。

特务：负责政治思想的统治，搜集情报。通化日本宪兵队派来了一个名叫高云龙的宪兵补，来七道沟的公开身份是劳务系的考勤员。高云龙特别狠毒，无恶不作，工人背地里叫他“活阎王”。高云龙在矿上还发展了一批“腿子”，和他一起经常出入工人住的大房子、茶馆、饭店、小杂货铺等公共场所，监视工人的活动，专门为他迫害矿工搜集情报。

八大系：是七道沟采矿所的下设机构。有劳务系、生计系、经理系、庶务系、工作系、矿采系、用度系、警备系。这八个系，把矿工的政治、思想、劳动、工资、经济、生活管制得严严实实。特别是劳务系，矿工最痛恨。它名义上是管理矿工的劳动、工资等业务，实际上是专门迫害矿工，矿工们管它叫“老虎系”。劳务系的外勤，矿工们叫“老虎爪子”。他们在工房里乱窜，敲诈勒索，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封建把头：在七道沟铁矿有10多个“组头”。比较大的有：赵华荣组、盛景奎组、赵福纯组、王才组、王秀峰组、庆泰组、神谷组、本月组、丰原组、大仓组、庄组。大把头下面有二把头，二把头下面又有拉杆的、带班的、催班的、溜掌子的等名目繁多的小把头。这些大小把头对矿工施展各种手段进行残酷的迫害，是日本人“以华治华”的忠实工具。

矿工们把日本鬼子、警察、特务、封建把头叫“四条毒蛇”，不管叫哪条毒蛇咬着，不死也得发个昏。

那个时候“罪名”真多。议论国事是“政治犯”，有病弄把大米熬点粥喝是“经济犯”，几个人在一起唠几句嗑就是反满抗日的“嫌疑犯”，想离开矿山的是“逃跑犯”。

特务、警察、老虎爪子整天像游魂一样分散在各个角落，看着哪个矿工不顺眼，随便给安上个罪名，用各种酷刑进行残害。轻的是一顿毒打，重的刑罚有十多种：过电、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用火烧、上大挂、夹手指头、用火筷子烙、狼狗扒心……还有一些叫不上名的残酷刑罚。

三、经济上的剥削

日本侵略者是大吸血鬼，汉奸警察、大大小小的把头是小吸血鬼。他们互相勾结，利用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手段，对

矿工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广大矿工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饥寒交迫的生活。

矿工们拼死拼活地干一个月，到了开饷时被七扣八扣，工资所剩无几。当时扣工资的项目有：扣铺底费（指招工来矿的食、宿、车费和所谓的“安家费”），扣报国储蓄金，扣大东亚圣战捐，扣福利费，扣卫生费，扣抽份钱……

矿工魏春德说：“在山东报名时给了10元钱，到了矿上以后月月扣，也不知道欠下了多少钱，真是干不完的活，还不清的帐。在矿上，我们3个人干活还养活不了7口人。每月每人应挣40到50元。到了开工资时，七扣八扣，只剩10到20元，有时候连这个数也拿不到。”

矿工们有时遇到婚、丧、嫁、娶、生、残、病、伤缺钱用的时候，把头们就放高利贷。借一元还两元，有的借一元还三元，矿工们管这叫“驴打滚的利”。

贪安葬费，吃空头饷。矿工死了，按规定矿上发给家属几个很少的“吊慰金”。把头们是雁过拔毛，人死了也不放过，没有一户家属领到过“吊慰金”。他们按上死者的手印和脚印，把钱领去。他们常以死亡、逃跑的矿工名字领空头饷。

把头们还在矿区开粮店，开饭馆，开当铺，开杂货铺，以高价卖给矿工生活必需品，从中渔利。

每天开饷后，把头们就大设赌场，诱骗矿工们赌钱。矿工们输的也好，赢的也好，最终钱都叫把头抽红抽到腰包里去了。

敲诈勒索、欺骗榨取，也是把头常用的手段。逢年过节和把头家婚丧嫁娶时，矿工们都得送礼。没有钱借钱也得买个“顺当”，不然的话，不定什么时候找上别扭，就受不了。

1942年，架子工纪成兴在山东的老母亲有病，来信叫他回去。纪成兴在矿上干了6个月，没剩下一分钱，架工组的工友给

凑了100元钱，叫他回家给母亲治病。这事叫把头肖长江知道了，他想方设法刁难纪成兴，不让他走。纪成兴被逼无奈花钱请了肖长江的客，这还不行。肖长江对纪成兴说：“你路上带这么多钱不行啊，火车上检查出来要没收。这样吧，你把钱先交给我，等你到家时我再给你汇去。”纪成兴明明知道这是勒他的大脖子，为了回山东看望重病的母亲，又把50元钱给了肖长江，肖长江这才放他回山东。

四、精神上的愚弄

日本人利用各种手段向矿工进行奴化教育，什么“日满亲善”建设“王道乐土”，“日满一德一心”，为“大东亚圣战”增产。

每天早晨上班时，工人们站成队，带班的把头领着向四方“遥拜”，向东拜“日本天皇陛下”，向北拜“满洲国皇帝陛下”，向西拜“忠灵塔”，向南拜老君爷，祈求保佑平安。这叫“拜四方”。拜完了四方呼口号：“击灭米英”、“增产增产”。呼完口号再去上工。

魏春德刚从山东来到矿上登记时，管事的问他是哪国人，他说是中国人，当时就叫警察打一个嘴巴子，把他打懵了，他说我确实是中国人，又是一顿嘴巴子。旁边的矿工告诉他说是满洲人，这才算了事。事后，魏春德明白了，在这里，中国的这块土地应说成是“满洲国”，中国人在这里变成了“满洲人”。

七道沟的东北方有一个小山头，日本人和把头在山上修了一座“老君庙”。庙里设有老君爷的牌位和香案，供人们去朝拜。他们宣传说老君爷是主宰矿工命运的神，矿工中发生了死伤事故和家中的七灾八难，那是因为得罪了老君爷，只有诚心诚意地敬奉老君爷才能免除灾难。他们用这种封建迷信思想来愚化

矿工。

居民区的东山根还设有大烟馆和妓女院。他们用鸦片和妓女来麻醉矿工，软化矿工的反抗意志。

五、悲惨的矿工生活

把头们招骗工人时说到七道沟住洋楼。刚进七道沟确实能看到几座洋楼，这楼是日本人、警察特务、宪兵们住的。矿工住的是马架子、席棚子、一面坡。墙是用板子钉的或石头砌的。上盖有的用铁皮钉的，有的用瓦苫的。这些房子冬天透风，夏天漏雨。冬天像冰房，四壁都上霜，夏天像蒸笼，热得喘不上气来。下雨时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不下屋里还滴答。有时蛤蟆都蹦上了床。屋里是锅台连着炕，锅底下烧火满屋子冒烟。只有少数的工房搭有火炕，多数的是用木板搭的床，还有的只在屋地上铺层草睡觉。一栋房子住100多号人。没有间壁，单身还好说，拉家带口的更难，一家分一段床，不管男女老少挤在一起，一栋房子住10多家。

刚来时，还有几床被子，几年后，旧的盖破了，新的买不起，有的几口人盖一床，有的盖麻袋片。有很多矿工睡觉时不脱衣服，借以取暖，上班时还是这一套。矿工们说这叫“起来一身，躺下一铺。”

带来的几件衣服，破了就补，补丁摞补丁。冬天时单改棉，夏天时棉改单。实在不能穿，花高价从卖店里买更生布。更生布像箩底，生了虱子都没法抓。根本没有工作服，下坑穿什么，回家还是这一套，一看衣服就知道你是哪个坑的。当时有一套喀：东山红西山黑，打眼放炮的一身灰。因为东山是赤铁矿，矿粉落在身上是红色的，西山是磁铁矿，矿粉落在身上是黑色的，打眼放炮的落一身石头面子，是灰色的。

坑下常年有地下水，只有日本人和监工的把头才能穿水靴下坑，一般矿工有时连胶鞋也穿不上。打眼工刘家有在小八号掌子干活，没鞋穿，脚踩在矿石上像刀子割似的直淌血。第二天在家补鞋，叫催班的把头王丙金看见了，硬逼刘家有上班。刘说：“我没有鞋穿怎么上班？”把头说：“你他妈的还敢和我顶嘴？”说着就抡起镐把，把刘家有好顿打。矿工们说合着才算拉倒。王丙金临走时还说：“你再不去上班，我就打死你。”刘家有又气又恨，一只脚穿了只破胶鞋，另一只脚穿了只草鞋，一瘸一瘸地去上班。到了坑下他架起“气盖”（凿岩机）打眼，越打越伤心，眼泪刷刷往下掉。打好了眼他去领炮药，领回炮药没往眼里装，他把炮药拿在手里点着了，刘家有就这样悲惨地死去。

矿工们出的是牛马一样的力，吃的是猪狗不如的饭。一年365天，没年没节，吃的大部分是苞米面，喝顿高粱米粥就是改善了生活。当时在“工人卖店”当杂工的孙洪章说：“苞米面也不一样，有大袋的，有小袋的。小把头们吃的是小袋面，小袋面推得细，色黄，好吃。工人们吃的是大袋子面，里面什么都有，有草棍子、席眉子、砂子、石头，捂的红一块，绿一块，一打开麻袋，那股捂味都呛鼻子。上班的一天给一斤多，没有副食，根本不够吃。有病的，缺勤的，耽误一天扣一天，就更不够吃了。家属每月只给20多斤。”到了伪满后期，捂苞米面也供应不上了，有时配给橡子面，橡子面看样子挺好看，焦黄的，吃起来又苦又涩，咽不下去。拉家带口的就去挖些野菜充饥。单身的矿工上班，一天发两个窝窝头，发几粒盐豆或者是几根咸菜条，往窝头眼里一放，把两个窝头一扣，用根铁丝穿起来挂在腰里去上班，这就是一天12（或14）小时的饭。窝头挂在坑内，矿石粉落一层。渴了喝点坑内的长流水。

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疾病和死亡严重地威胁着矿工。小病咬着牙硬挺，一是因为把头不让，矿工每上一个班把头能赚两角钱，二是矿工们不敢歇，一说有病就往“病栋”里送。“病栋”外边拉着铁丝网，有人把着门，病人不让出来。家里人不让看，渴了连凉水都没人端，也不给打针，也不给吃药。小病住重了，重病住死了。有的病人还没咽气就往万人坑里抬。矿工张广飞得了伤寒病，还没有咽气，日本大夫就让装进了棺材，刚抬到万人坑，他磕头兄弟知道了，急忙追到万人坑，磕头兄弟要最后见他一面，掀开棺材板一看，心口窝还动弹，用手一摸鼻子还出气，抬回家放在热炕上暖了一个多小时，又活过来了。还有个叫张占清的矿工，突然发高烧，昏迷过去，不省人事。鬼子说他得的是传染病，没有救了。叫专门抬死人的杠子队往万人坑抬。走到河边时，他们才想起来忘了带铁锹，一个外号叫张大个子的回去拿锹。他还没回来，张占清就苏醒过来，能说话了，这才没有被活活埋掉。

在干活中受伤的也是没人管。17岁就上矿山干活的杜有安（现住七道沟镇，享受劳保待遇）20岁那年在东山二露天矿干活的时候，叫轱辘马压坏了两脚，当时脚趾头还能动弹，治一治很快就会好。他被人送进了医院，医院也不给打针，也不给上药。一个星期后伤口发了炎，生了蛆，两腿肿到膝盖，发了黑。日本人连麻药都不给打，硬把两只腿从膝盖锯了下来，推出了医院，造成了终身残废。

带家属的矿工不但自己失去了人身自由，自己的家庭也经常受到警察特务、把头的破坏，妻室受到他们的蹂躏和摧残。宪兵补高云龙，经常在矿工住宅区乱窜，谁家的妇女叫他看中了，就逃不出他的魔掌，叫他奸淫的妇女无计其数。有个姓王的妇女没顺从他，跑到五道江亲戚家去躲藏，叫高云龙知道了，一

直追到五道江把这个妇女奸污了才算罢休。矿工朱宝和的妻子年轻漂亮，被盛组的把头李照秀看中了，他趁朱宝和上班的机会，去调戏朱的妻子。朱宝和为人忠厚老实，明知自己的妻子被李照秀污辱了，也敢怒不敢言。李照秀认为朱宝和软弱可欺，竟想长期霸占朱宝和的妻子。李照秀借催班为名找碴毒打朱宝和。朱宝和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妻子，李照秀就用逼迫的手段将朱妻藏起来，千方百计下毒手把朱宝和置于死地。朱宝和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忍气吞声含着眼泪离开了矿山。

那时候的矿山是受骗的多，讨饭的多，挨打受骂的多，劳动时间多，妻离子散的多，缺胳膊少腿的多，生病的多，死的多……

六、万人坑

从1938年到1945年，在这八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从七道沟铁矿共掠夺了135.8634万吨矿石，留下的却是1.6万多具中国矿工的尸骨。

7道沟共有三个万人坑，铁道西建有死难矿工纪念碑的矿工墓是最大的一个。往沟里走，还有曹家坟万人坑和板房沟万人坑。后来，日本人又建了两座炼人炉。

在这些死难的矿工中，有的是因“以人换矿石”的事故致死的，有的是因恶劣的劳动、生活条件致死，有的是因各种疾病致死的，有的是因政治迫害致死的。日本人到七道沟来开矿，目的就是掠夺矿石，他们把中国矿工当成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常说满洲苦力大大的有，死了没关系。在作业中根本就不注意矿工的生命安全，入坑好像下地狱。

坑内通风设备不完善，放炮后炮烟长时间排不出去，日本人逼着矿工顶着烟下坑作业，有很多人因炮烟中毒而死亡。1943

年，西三坑因炮烟中毒一次就毒死7名矿工。日本人使用“残柱法”采矿，坑内支柱很少，片帮冒顶的事故经常发生。1941年东斜坑冒顶一次就砸死了9名矿工，东山水平坑一次冒顶砸死了8个人。1944年，东斜坑二路十八排溜子落下来大块的铁石砸死了9名矿工。最残忍的是，有一次露天坑坑口冒顶，坑内有8名工人被堵住了。工人弟兄们想扒开坑口抢救，日本人不让，这8名矿工活活的闷死在矿坑里。

矿工下坑作业，两三个人给一盏矿灯，推矿车的有时不给矿灯。工人们常说：“坑下黑、坑下黑，摸着铁道往外推。”碰伤压伤的事故经常发生。有一个姓张的扛钎工，上班时采矿所不给电石，矿灯不亮，摸着黑往坑下走，掉在漏子里活活摔死。

在坑下每天要进行12到14个小时的劳动，星期天倒班时要干整整24小时。从关内骗来的矿工，初到异乡水土不服，一路上的疲劳还没消除，又被赶下了坑内。恶劣的生活条件，过长的劳动时间，使瘟疫病在七道沟滋生蔓延。从1938年开始，瘟疫病几乎年年都发生。1941年赵华荣组从山东招来了500多名工人，来时正赶上瘟疫病流行，不到10天死了400多名。1938年到1945年，赵华荣组从山东骗招的工人有1800多名，到1945年光复，仅剩下了200多名。

1964年建死难矿工纪念碑时，挖掘过一些墓坑。从墓坑的断面来看，多数是埋了三四层。有的墓坑中的尸骨一堆一堆的，也分不出是埋了多少具尸体。从挖掘的尸骨中看到，有的缺胳膊，有的少腿，有的颅骨有一个大窟窿，还有用铁丝棘子捆的。在这些死者当中，除了因病伤死的而外，还有一些是受到政治迫害致死的。

(通化市政协供稿)

日本法西斯在黑龙江省 鸡西煤矿的罪行

笑林整理

1940年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节节失败，国内资源枯竭，日本侵略者公然在它所统治的鸡西各个煤矿提出了“少吃饭，多出炭”和“少用木头换煤炭”的口号，使矿区大面积空顶作业，加之井口通风不良，大冒顶和瓦斯爆炸事故层出不穷，死亡矿工人数成倍增长。日伪统治者为了处理大批矿工、工人家属的尸体，先后在恒山、滴道、城子河、麻山等矿修建了十几座死人仓库，挖掘了七个万人坑，每天用大车或汽车从死人仓库、病号房（工人叫它“太平房”）源源不断地向万人坑运送尸体，造成矿工心理上的极大恐惧和愤慨。日本法西斯为了销尸灭迹，掩人耳目，又在各矿设置了烧人场，修造了炼人炉，不到8年时间，就烧掉了近5万具尸体。令人发指的是有的矿工、工属不等断气就被扔进死人仓库、万人坑或投入烧人场、炼人炉活活焚毁。

下面是部分老矿工对日伪统治时期鸡西各煤矿的死人仓库、万人坑、烧人场和炼人炉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的悲惨事件。

城子河煤矿五井地区老工人张生讲：我是伪满死人仓库的见证人。伪满煤矿的死人仓库是临时放矿工尸体的地方，凡是矿工集居的工棚、训练所、矫正院都设有死人仓库。城子河矿的死人仓库是1942年设立的，比较大的死人仓库有三处：矫正院死人仓库、训练所死人仓库和二太堡死人仓库。死人仓库存放的尸体开始是用两副活底棺材往万人坑抬；后来死的工人越

来越多，就用牛车或汽车往外拉。我是1942年日本人派到特殊工人训练所死人仓库拉死人的。凡是死难的矿工和工属，不管男的、女的，衣服都被把头扒光卖了，然后把白条尸体成垛成垛地码在死人仓库里，我每天赶着大车从死人仓库里往万人坑或烧人场拉死尸。日本人把拉死尸的车叫做“白条车”。一车装十四五具尸体。夏天，死人仓库每天存放的死尸三五十具不等。冬天，每天要存放上百具尸体。把这些尸体拉到二太堡的万人沟（坑）后，五六十具尸体垛在一起，然后浇上火油，点燃棒子烧掉。从1942年到1945年，仅城子河煤矿这三座死人仓库就拉出尸体5 000多具。

当时我们矿工把日本人叫小鬼子，其实他们的心比小鬼子还要狠，有些伤病工人没等断气，就被拉到死人仓库上垛；一经上垛，就是不饿死，也会被上面的尸体压死。我们城子河矿现任矿长聂志平，1942年被日本人从山东临沂市抓到城子河当劳工，因得了重感冒，日本人硬说是“伤寒病”，让把头刘百荣和陈广友把他拖到死人仓库，聂志平的叔叔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刘把头救他侄子一命，反而被刘百荣用炉钩子劈头盖脑打了七个大包。后来多亏他叔叔把聂志平藏起来，才幸免一死。而和聂志平一块从临沂抓来的斗云生因病没等咽气，就被日本人拖进死人仓库上了垛，被活活压死了。

死人仓库得重生

滴道煤矿老工人赵同山讲：1943年我在安东丝房做工。一天下班回家，在街上被日本兵抓住，硬我说是“政治犯”，被押送到滴道煤矿特殊工人训练所后，逼着把我的眉毛剃光，衣服扒光。从此，我穿上了“249”号更生布囚衣，每天被矿警用枪押着下井刨煤，当时我们电网工人，吃的是又苦又涩的橡子面

窝窝头和白水萝卜条汤。由于工人普遍营养不良，身体缺乏抵抗力，一有传染病就很难逃脱。我下坑不几天就得了伤寒病，发高烧，说胡话。伪满煤矿的医务所是专门给日本人和把头特务看病的，我们煤矿工人靠不上边。所以那时候我们矿工得病，除了求神拜佛或弄个偏方吃吃之外，就只有等死。

我得病以后，一连几天滴水不进口。这天上午，翻译领着一个日本人进来，指着我和另外一个有病的工友说：“你们两个不行了。”那个日本人说了声：“快快拉走！”就捂着鼻子走了。不一会儿来了两个外勤，抓住我的胳膊往外捞，不管我怎么挣扎、求救都不顶用，他们连拖带打，我终于被折腾得昏了过去……晌午12点左右，我慢慢地清醒过来，当我睁开眼睛一看，只见黑乎乎一片，我用手一摸，才知道自己躺在死人仓库的活底棺材里。我立即感觉到，如果我不能爬出棺材，就会被扔到烧人场活活烧掉。一种求生欲给我带来了力量，我终于推开了薄薄的棺材盖，用尽全身力气，爬出了棺材，爬出了堆满尸体的死人仓库，爬到了水楼子。我找了一个满是铁锈的罐头盒子，一连喝了八盒子水，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轻松了许多。就这样，我在工友们的照顾下，总算逃离了死亡线。和我一起从安东抓来的72个人，除我熬到解放外，全部死在电网里和矿井下。

烧人场里找亲人

鸡西煤矿机械厂李军海讲：随着矿工和工属死亡率的不增长，到1942年，各矿的死人坑的尸体已达到饱和状态。每到夏秋，细菌扩散，致使传染病蔓延，人心惶惶。于是，日本人又开始在各矿划出荒山僻野作为烧人场。每当黑夜降临，烧人场是浓烟弥漫，火光冲天。寻夫唤子的号哭声彻夜不绝。我的母亲和妹妹就是被把头活活烧死在万人坑的。

我老家在山东省安邱县。1942年2月，被把头张广太骗招到城子河矿创煤，刚来不到两个月，我和母亲、妹妹都得了伤寒病。一天傍晚，狗腿子闯进工棚，抬起小妹妹就往活底棺材里扔。小妹妹挣扎着、叫喊着：“妈妈！妈妈呀……”我和娘拼命地爬起来，去救小妹妹！狠心的狗腿子一脚将娘踢倒，我也被把头一镐把打昏过去。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被一起拉到了烧人场。

不知什么时候，我清醒过来，只见眼前一片漆黑，我一边用手摸索着，一边哭喊着：“妈妈！妹妹！你们在那儿……”我拼命地爬着，喊着，绕过一个尸垛，又绕过一个尸垛，但回答我的只是凄厉的狼嚎和嗖嗖的风声……我又昏过去了，等我再次清醒过来，天已大亮。原来那一垛垛的尸体已化成了一堆堆的骨灰，正在冒着呛人的浓烟，天哪！我那可怜的妈妈和妹妹，已经化为灰烬了。

我忍着割心一样的苦痛，想找到妈妈和妹妹的一点骨灰，可是这一堆堆的骨灰怎么辨认啊！我呆呆地瞅着还在冒着浓烟的白骨，不禁放声痛哭起来……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听人说过，用自己的鲜血可以辨认亲人的尸骨。于是，我咬破中指，用鲜血滴在一块块白骨上，我的十个指头都咬破了，也没有认出亲人的尸骨来。

眼看天又要黑了，我又渴又饿，胡乱地拣了两块骨头，回到工棚里，在工友的照看下，我总算死里逃生，活了下来。

（鸡西市政协供稿）

日伪时期北票矿工的苦难生活

陈树堂 高润甫 杨伙峰 口述
王瑞林 李文桐 整理

我们是年过古稀离休的老同志，也是日伪时期北票的老矿工，现在正安度晚年，在这晚年的幸福生活中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结合亲身经历，查阅了有关资料，今天和大家共同回忆日伪时期北票矿工的苦难生活。

祖国光复后，在我们矿工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昔日矿工悲歌多，
矿工血泪染山河，
只见煤车天天走，
不见矿工几人活。

这首歌谣控诉了日伪在北票掠夺煤炭，残害矿工的罪行。日伪在北票矿实行的是“人肉开采”政策；采取的是“以华治华”的手段。他们利用“把头制度”，以最低限度的投资，通过“把头”呼喊着“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支援大东亚圣战完遂”等反动口号。强制矿工“大采炭”，进行疯狂地掠夺。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在日寇统治12年又5个月中，共夺走精煤8 639 638吨，这些煤炭都是用矿工的生命换来的。在这一时期内，先后共招募、欺骗、捕抓、逼迫、接收进矿的矿工56 530余人，被摧残致死的31 200多人（其中不包括伤残者及其家属），占进矿总人数的55.2%，平均每生产277吨煤，就

付出一名矿工的生命。我们亲眼看到，日寇拉走的是乌黑锃亮的炼焦煤，给我们留下的却是堆堆骷髅，嶙嶙白骨。

一、三种矿工，共遭苦难

日伪时期好多人把我们这些人都叫劳工。其实不然，在我们这些人中大致可分为三个范畴，即：矿工、劳工、童工。

其一，是矿工。这部分矿工是在1938年以前，“大柜把头”从河北、山东的灾区招募来的，其中有小手工业者、无业游民，绝大部分是由于天灾人祸，兵燹而破了产的农民。这些人来到矿上以后，单身的住进“独身寮”宿舍，带家属的给一间矮小的房子，只给微薄的工资，他们是“大柜把头”重点剥削的对象，也是他们利用的对象，所以日伪后期多数人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也有极少数人变成了“大柜把头”的帮凶。

其二，是劳工。使劳工进矿的办法有：

(1) 欺骗无家可归的农民当劳工。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华北和华东地区，由于战争造成了大批无家可归的农民，日寇和“大柜把头”乘机四处派人，打着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的招牌，摇着“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所谓满洲国的国旗，到处游说：“到北票做工吃大米白面，开现钱，带家的还给安家费……”有的难民为了活下去，被欺骗性的宣传所迷惑，就报名来到了北票矿，落入了人间地狱。此外，1941年，日伪还派“大柜把头”到绥中、兴城等地区，和当地汉奸勾结，以移民的名义将1000多渔民骗到北票当劳工。日伪叫他们住在三宝二工村和五工村的大席棚里，不论独身的还是带家属的都住在一起，铺的是秫秸把，枕的是砖头、木块，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2) 趁火打劫抓劳工。当欺骗的谎言很快被事实揭穿之后，灾区人民逐步觉醒，他们再不受骗了。三宝矿“大柜把头”和

一名翻译到关里又去欺骗灾民，不但一个没骗来，反而被灾民暴打一顿狼狈而归。于是日伪又开始由骗劳工到采取野蛮手段抓劳工。当时抓劳工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日本侵略者在山东、河北摘集家并村时从“人圈”中抓。二是在清乡大扫荡中抓。被抓的劳工，在矿上遭受更大苦难，纯属半奴隶状态。

(3)从日本关东军手中接收在抗日战场上被俘的自卫队、八路军、民兵与革命群众等，他们被称为“特殊工人”。从1941年开始，在日本侵占区内，每年都有200万，中国劳工从事繁重的苦役，而大部分来自华北。1942年军方需要劳工40万其中华北占4万人，又据《满洲国史》记载，1941年以后，年年有10万人送往东北，北票也是年年有大批“特殊工人”进矿。这些人遭受的是法西斯统治。

(4)逼迫农民当劳工。这个办法产生在北票，以后在全满推开，当时北票为吐默特右旗，旗里有个总务科长是日本人，名叫板本登。他认为北票矿到关里招工有三大弊病：第一，大量资金流入“国外”；第二，容易混入共产党人和八路军；第三，关里人来到北票后都想逃跑，跑了又难以抓回。为此他们炮制出一个“地盘育成”方案。它的主要内容是凡属于年满18岁至50岁的男性“良民”都有到炭矿当劳工的义务；每个男性“良民”分三期服役，每年4个月，三年期满（以后改为6个月）；期满后发给免役证书；服役期间一切饮食费用自备。

为确保炭矿人数的需要，在吐默特右旗的旗公署内设动员科、劳务科和矿务局对口联系。在旗公署所属22个村公所又增设了助理员，专办此项事务。

其三，童工。日伪时期北票矿还招有4000多名童工。这些人是无父母、无吃穿、无家可归的“小花子”。他们每天要从事繁杂的体力劳动。少数人给鬼子扫地、生炉子、送饭盒。多数

人同大人干类似的活计。他们用肩扛着火药往井下送，还要装卸煤车干苦力，他们碰见日本人还得请早安，问午安，如果忘了就不给饭票、挨皮鞭子或者被指令到老君庙前罚站。他们干一天活只挣三四角钱饭票，连买衣服的钱都没有，所以身穿的衣服褴褛不堪。他们的行动没有任何自由，上厕所也要拿“出恭牌”。

二、“把头制度”克扣盘剥

日伪时期，北票矿组织生产的方法是实行“把头制度”。“把头”也是最为我们矿工所痛恨的。当时北票有34家“包工大柜”，“大柜把头”有58人。这些“把头”虽然都是中国人，但在他们身上没有中国人的气味，他们对日寇一个比一个效忠，对矿工一个比一个残忍，互相间一个比一个奸诈。这种制度原产生于封建社会，可是日寇却把它当成奴役、驱使中国矿工最有效的办法。他们的做法是：每个采炭所，设一名日本人当所长（他手下有各系的日本系员）做为矿方的代表，由他把采煤任务包给一至两名“大柜把头”（大柜把头手下各有数目不等的“书记”，其中催班书记最坏），“大柜把头”再把任务下达给“二把头”，由“二把头”再分配给“小把头”（小把头也叫老板子，他是带班干活的）。为给“二把头”、“小把头”做出样子，还设有“直辖把头”，为监视“二把头”和“小把头”还设“查头”。这种“把头”制度，在北票煤矿确实存在着，而且一直延续到祖国光复。

我们认为那时的“大柜把头”，像蚊子、臭虫一样叮在矿工们的身上，吸吮着矿工们的血汗。他们剥削矿工的手段首先是按掌握矿工的总数，从矿工工资总额中进行6%~15%的提成，其次是多报人数吃空头饷、开赌场、放高利贷、开当铺、开大烟馆、贪污矿工的安家费、抚恤金等，有些“二头”也想尽办

法敲诈劳工。服役劳工进矿，劳工要通过“仕化人”（带劳工的小头目），向“工头”交溜须费，交上的，第一天就把你分配到安全的采区；交不上的、不愿交的，或不懂这项套规的，就把你送到危险的掌子面，轻者负伤，重者丧命。

“大柜把头”对矿工的剥削是无孔不入的。他们是月月克扣的，名目也五花八门，什么手续费、铺店费、电灯费、预收费、报国捐、考费、大柜筹款等，甚至把修老君庙的费用也扣进去。就是通过这样的剥削，吸取工人的血汗的“大柜把头”养的脑满肠肥。仅以宋玉为例，每月收入6420元，等于420个普通工人的收入，他雇用了36个人为他家服务，家有高墙深院，有妻有妾，并有穿不完的绸、缎、皮、棉、纱。然而被他们剥削的矿工，因饥寒交迫死于井下、抛尸荒山，其家属因停薪断炊，被迫沿街乞讨，甚至有的到交易市场横插谷草（旧社会妇女卖身的标记）自卖其身，另寻活路。

三、残酷统治，动用宪兵

1937年4月1日，北票炭矿股份有限公司，因受抗日运动的影响，煤炭产量不断下降，煤炭又难以运出，被迫宣布改组，由满洲实炭株式会社与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合资经营，定名为北票炭矿株式会社。

日寇为实现“大东亚共荣”煤炭自给自足的计划，加强了对矿工的统治，建立起了10课、8所、39个系。其中专门统治镇压矿工的机构有警务系、劳务系和宪兵队。

警务系，就是矿卫队，各采炭所也设有矿卫队，全矿共200多人，用日本人的话来说，他们的任务是维护矿山秩序，实际这些人都是日寇的打手，他们可以随意绑架打骂矿工。

劳务系，是政治性的统治机构。这个机构一方面勾结地方行政部门捕抓服役劳工，并负责分配工种，发放劳动用品，发

放饭票，掌握公伤病疫，井口记工，催逼矿工上班等。另一方面在各工村设立劳务所，在各交通要道设立“异动防止班”，有明岗暗哨。在各“独身寮”，还设一至两名炕长，表面上他们的任务是扫地、烧炕，实际是劳务系的坐探。这个系统共有890多人，其中有些人是狗仗人势表现很坏，所以矿工叫他们“老虎爪子”。

1939年以后，先后有大批“特殊工人”进矿，其中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和八路军，他们来自抗日战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进矿以后，很快的就点燃了抗日烽火。尤其在1943年1月，又从“石门教习所”（石家庄）接来200多名“特殊工人”，其中有冀中军区《前线报》的编辑董德康（孙大栓），十八团排长王福荣，河北省易县公安局长刘堤，四区抗联会干部于仲贤，碾子沟村党支部书记叶重生，晋察冀一分区某团一营侦察员李国华、赵良田、王春和、邸永顺等。他们进矿以后，互相之间很快就取得联系，并着手组织工人群众开展了磨洋工、制造事故、停工停产等反抗活动。他们还曾夺下矿卫队的枪向敌人开火，把鬼子打死扔进老塘里。像这样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以及矿工自发罢工暴动等反抗活动，把鬼子和“把头”搞的晕头转向，昼夜不宁。日伪为镇压矿工的反抗活动，于1943年11月从锦州又搬来了宪兵队。这个宪兵队设在舍宅一公馆，它是锦州宪兵队的派遣队，共30多人。它的任务是侦察破坏我党的地下工作，搜集矿工思想动向，防止矿工暴动，残害反满抗日人员。宪兵队下设矫正辅导院，设有辅导官，备有刑讯室，室内有捕绳、铁链、防声具、电椅子、脚镣、手铐、战刀、皮鞭、烙铁、水壶、老虎凳、各种大大小小的御头等刑具。

宪兵队直接与矿里的警务系、劳务系和吐默特中旗警务科、北票邮电局、电报局、火车站、协和会等部门联系，形成一个

情报网，通过检查信件、抓捕审讯、控制电报、清查户口等手段搜集我党地下活动情况。日寇就这样在北票组成了一个环环紧扣的法西斯统治系统，对矿工进行恐怖统治。

四、疯狂掠夺，血腥统治

1942年至1945年，是日本在整个侵略战场上垂死挣扎阶段，也是日伪在北票煤矿对矿工的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阶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停止了对日本的援助，日本在侵略战场上面临兵源和能源枯竭的境地。为解脱这种危机，梦想掠夺更多的煤炭，达到“支援大东亚圣战完遂”的罪恶目的，就强制矿工“大采炭”。此刻“大柜把头”也到日人面前摇唇鼓舌，他们无耻地说：“请太君大大的放心，我们有的是山东‘嘎子’、河北‘老畜’，保证大采炭完遂……。”

“把头”们为提高他们的总额提成，野蛮地强迫工人下井。每到上班时间，“把头”、“催班的”有的握着木棒，有的拎着带尖嘴榔头的手杖，还有的牵着狼狗到各工村“独身寮”、大工棚里催班。他们有句口头禅：“脑袋硬就得下井”，谁要稍慢一点，举手就是一棍，如果有反感就用尖嘴榔头打。冠山劳务系的“把头”刘瑞安，到冠山二工村去催班，榔头刨到矿工的太阳穴下，当场死去。台吉矿有个鬼子叫“野口”，他专门做了一件打人的凶器，样子像扁担，上刻“打死无论”。他们把催来的矿工赶到井口“操入所”签到，而后逐一搜身赶入井下。更可恨的是他们还趁催班之机，惨害矿工家属。

日伪对矿工的政治迫害也是很惨的。三宝有个工人叫王景瑞，一天，在井口上和一个矿工小声的说了几句话，当晚就被抓到警务系，以“私谈国事”的罪名被刑讯，硬逼他说出谁是八路军，他说不知道，就在他的手指脚指上接上电线，用电刑

逼他。

遭受苦难最深、最苦、最惨的是“特殊工人”。1943年1月从石门（石家庄）“劳工教习所”押送来的200名“特殊工人”就是一例。

这批“特殊工人”来到北票被送到台吉矿，由荷枪实弹的警察押着接受检查，发现不顺眼的，行动稍慢的就当众毒打，经检查搜身后送进“报国寮”。“报国寮”也叫独身宿舍，实际是法西斯监狱。它有几个带铁栏小窗口和一个大铁门的人行道，道的两侧设有电网，网外还架一道刺线墙，墙外有警察流动哨。在“报国寮”的外围还设有岗楼，楼上有警察了望。室内冬季霜雪满墙，夏季闷热，蚊子、臭虫、跳蚤、虱子横生，空气十分污浊。

“特殊工人”的主食是发了霉的苞米面、橡子面、烂土豆，最好的是文化米（小高粱米），早晨二两，午间四两窝窝头；副食有点烂咸菜，最好是黑豆加海盐，煮熟以后装入麻袋叫大家抓食，由于食宿条件恶劣，再加上关里人乍到北票水土不服，好多人不到半年就被折磨而死。

“特殊工人”的柳条帽上有红圈记号，每天由警察押送到井下“特别采区”冒险作业。每日都有人死于井下，尸体遗之路旁。当时境况叫人惨不忍睹。

五、骷髅满壑，嶙嶙白骨

日伪统治末期，广大职工都被折磨得筋疲力竭，血汗枯干。他们中不少人被冻死、饿死、片帮冒顶砸死、跑车撞死、透水淹死、瓦斯爆炸烧死、用各种刑具害死，还有的被带气活埋，死得都很悲惨。尸骨处理使人心寒，最初黄土盖脸一尸一坑。没有几年时间，在北票的南山、城子地、台吉的南山、三宝的窑沟形成了群群荒冢，出现了大片的“遗地”。就这样在北票形成

了五处万人坑。其中比较大的是城子地万人坑和台吉万人坑。据1968年矿务局挖掘结果，仅在台吉南山处不足1.7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挖出6500具尸体。从尸骨中看，有的被铁索子捆绑着，有的带着镣铐，有的被刨穿颅骨，有的被打断了腿骨，还有的张着大口形似呼叫。

（摘自《北票文史资料》第一辑）

北票炭矿警务系的罪恶活动

张涉任 邢千里

日本侵略者为了更加严密地控制与管理煤矿工人，大约在1933年正式建立起北票炭矿警务系。警务系主任是江文富，他曾任过洮安县警察局第四分局长。当时，警务系只有三四十人。

1933年夏季，日本侵略者把警务系和劳务系合并，但警察的衣着和任务没有变。这时，日本人井上任主任，江文富为副主任。

1934年春，炭矿的日本人增多了，日本人古泽又将警务系和劳务系分开，另成立矿卫系（又叫矿卫队），古泽任队长，江文富任副队长。是年冬，台吉、三宝工人增多，在冠山、台吉、三宝三个地区建了警察分队，矿卫系设立了大队部，这时卫队人数已增至200多人。大队部由日本人古泽、目兰和江文富负责。雇员有何玉坤管巡长，鲁德彬管服装和书写，于化一巡长和四名矿卫队员管接待、传达，一名巡长领5名矿卫队员，配三支大枪看守水源地。这时，又开始设便衣人员，负责侦察工作。

日本侵略者为控制警察分队，将冠山、台吉、三宝三个警

察分队的队长都配调日本人任职。

矿卫队的任务是：通过便衣人员暗地调查在工人中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在矿区出入口、材料场、井口、工村大门站岗；负责对“特殊工人”上下井押送。武器配备也逐步增加，有大枪40支，手枪7支，又向“在乡军人会”借了一部分枪支。

矿卫队是日本侵略者镇压矿工的一支反动武装队伍。他们随意抓捕和拘留矿工，有的矿工被送进警察署，有的被无辜判刑投入监狱，有的被随意处死。他们还肆无忌惮地残害“特殊工人”。这些“特殊工人”，绝大多数是由关内被抓来的八路军和我党地下工作者。每次“特殊工人”暴动逃跑，都由矿卫队追捕。其中警卫队的反动巡官刘广义最为卖力，他积极效忠日本侵略者，一次他由朝阳坐汽车押回6名逃跑的“特殊工人”，在他的喝令下将这些人活活打死。由于他镇压矿工得到日本人的赏识，便由一名矿警很快晋升为巡官。并曾两次得到日本侵略者的赏金、奖状和全勤章。而广大矿工对他恨之入骨，都叫他“刘扒皮”、“刘坏水”。

矿卫队对广大矿工冠以种种罪名，被判刑坐牢者不可估计。据老工人于德永、赵连才、刘登云、广井合等回忆，他们因当时生活所迫，偷了矿山铁锹等物，被警卫队抓获后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被判处3个月至1年的徒刑。

矿警积极效忠日本侵略者，到处抓可疑人员以求得赏。刘忠武从1942年至光复在北票炭矿警务系任巡长期间，因他会日语，便得到古泽大队长的重用，委任他领导便衣人员。对可疑人员，他便认为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日本人审讯时，他给当翻译，很多无辜群众受过他的打骂和酷刑。他领导下的便衣人员，为非作歹，便衣王正亭在冠山二工村经常横行霸道，打骂群众，勒索民财。有一次，二工村工人陶树亮家里被盗，反而

被他踢了几脚，打了一顿耳光，陶树亮由于憋气窝火，得中风不语症，不到一个月就死了。还有一些群众被他们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而投入监狱。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铁蹄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李长春 口述 李亚东 整理

伪满洲国时期我一直在扎赉诺尔煤矿当矿工，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矿产的罪行，参与了广大矿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下面，我说一些具体事：

陈大成是承德一个偏僻山区的贫苦农民，由于生活所迫，1942年冬被骗卖到扎赉诺尔，成了炭矿的劳工。

陈大成一家来到灵泉的第二天，大成就被一个姓林的把头赶下了一号井。从此，开始了牛马般的井下劳役。他每天累得挺不起腰，挨打、挨骂，却敢怒不敢言。为了有个安身之处，一家老小在工友的帮助下，在西山沟顺阳坡挖了个地窖子，用几块破烂木头，搭了个仅能容下5口人的“住房”，总算有了个避风遮雪的安身处。

但是他一家5口人的口粮却难以为继。每天虽然只吃苞米面和橡子面，一月也仅够吃20天。有一天刚到中午，大成饿得实在推不动车了。日本的监工见他速度缓慢，便说他偷懒，就一步一棒地打他，逼着往前推车。陈大成被打得遍体鳞伤，一阵眼花，口吐鲜血，栽倒在地。工友们刚刚把他抢救过来，两个日本人气势汹汹地把大伙打了一顿赶去推车，大成又被打晕

过去，两条腿被打断了。从此这仅能维持全家性命的一斤橡子面也无人去赚了。工友们不忍心看这一家老少饿死，每天都凑点橡子面送到大成家。但是，尽管大家勒紧裤带，又能省下多少给他们呢？本来就有病的大成老伴，没过几天就病死了。

残废的陈大成，死了老伴，剩下老的老，小的小。孩子们连饿带想妈，终日哭哭啼啼。老爹急瞎了双眼。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让15岁的儿子陈锁替自己下井干活。

在父子商量好的第二天，大成同班工友老罗和老魏求人买了两瓶酒，把陈锁带到二把头家。老魏强装笑容把酒推到二把头面前说：“让陈锁顶替他爹下井干活去吧？他家太苦了，老弱病残挺可怜的。”二把头抬起眼皮看了下陈锁，沉思了一会说：“好吧！看你们哥俩的份上，明天就叫这小子上工去吧，得好好干哪，要不就得活活饿死。这样吧，明天早上送去，先找我。”从此15岁的陈锁开始担起了一家4口人的生活担子。

1944年春天，陈锁上头班刚刚到井下，一个外号叫“损人”的日本监工，分配陈锁一个去挖一个老巷里的水圈。这个老巷是火区，已经封了一年多了，通风又不好。老魏见“损人”是要欺负陈锁，就向“损人”说：“我去！小孩的不行。”“损人”骂老魏：“巴嘎！”对陈锁说：“你的去，快快的。”老魏把陈锁拉住小声说：“千万注意，下山老巷水很深，掉下去就没命了。”陈锁点点头说：“魏大爷放心。”“损人”见陈锁行动不大快，打了陈锁一镐把，催着陈锁说：“快快的！”

“损人”逼着陈锁来到老巷入口，站住对陈锁说：“你的好好干活，不好的三滨的给。”陈锁钻进了刚打开的洞口，走进几步感到呼吸困难，把土篮和铁锹一扔，喊了一声“害怕”抽身跑出来。“损人”见陈锁跑回来了，拿着镐把向陈锁打来。陈锁一闪没打着。“损人”气急败坏的大骂。陈锁说：“我害怕，不

敢进去。”“损人”骂了声“巴嘎”，拉着陈锁往里走去。当走到陈锁扔土篮的地方，陈锁挣开“损人”的手往回退了几步，只听“损人”骂了声“巴嘎”便扑通一声掉进了下山老巷里，再没有动静了。陈锁又听了一会儿还是没动静，断定“损人”已死，大喊起来：“不好了！太君掉在下山老巷了，快来人哪！”老魏听到喊声赶来，问明情况说：“这可了不得，你得马上升坑回家，我随后就到。”

陈锁刚到家，老魏、老罗也赶来了，把情况和陈大成说了一遍，大成一听吓呆了：“这可怎么办呢？”老罗镇定一下，拉着大成的手说：“兄弟，事到如今，实在没办法了，日本人不能放过我们，你们要是信得过我，让我带着锁儿走吧。”“你带他哪儿去呀？这可是插翅难飞的地方啊。”陈大成着急地说。

老罗说：“我有办法，不能耽误了，天一黑我就带他去草地，那里有我的不少朋友。”

陈大成望着老罗泪如雨下，把陈锁叫到眼前说：“去，快去吧，跟着你罗大爷逃命吧。”老爷爷把仅有的一件破棉袄，披在陈锁的身上。陈锁拉着爷爷的手跪下说：“爷爷，我们怎么这么苦哇？”泣不成声。老罗催促陈锁：“快去吧！不然叫日本人抓到就没命啦。”陈锁告别了亲人，跟着罗大爷迈着急促的步伐，奔向渺无边际的大草原。陈锁走后，全家遭了殃。残废在家的大成被日本人活活折磨死，老爷爷也气死了。老魏帮助料理完后事，抱着陈锁的小弟弟奔向茫茫的大草原。

1943年刚刚入冬，一场小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上班的工友们都聚集在南煤沟二号井小牌子房门前背风避雪，等待着叫号头（工人中点名，只喊小铁牌上的号）。不一会儿，一个小把头出来喊号了。他先点了七个年纪最小的号码，让他们先下井。这七人平均年龄才十四五岁，由于生活所迫，为了每天一斤二

两苞米橡子面（杂合面）而下井拼命，以减少父母的负担。他们所下的二号井，由上到下200多米深。因怕着火封闭，完全用水泥发楦，绞车道两边很窄，只能通过上下的矿车。他们七人刚下去五分钟，一串矿车飞也似地冲下井口。七个十几岁活蹦乱跳的孩子被砸得粉身碎骨，血肉模糊。工友们用草袋子把七具幼小的尸体兜上来。把头说：“他们（指七个孩子）是图挣钱来的，不为钱他们能到这里来死吗？太君心肠好，念他们为增产报国多少出过力，每人给一口棺材。”天刚黑，不等死者家里人知道，就悄悄地把尸体扔了。当死难者的家里人来井口看人的时候，日本人不但不承认有此事，还弄来了许多便衣特务、警察、宪兵，硬说死难者的家属和工友们聚众闹事，中间有八路“煽动”，并把来的所有男人都抓到警察队，直到折磨得不像人样了，日本人把事先写好的“认错觉醒书”拿出来，强令按上手印，宣布不准乱说乱动，才算罢休。

七个童工白白地被撞身死，死后，家人连尸首都没有看到。

1939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凌晨，南煤沟二号井下，右八片人称大院的大窑里，一阵巨响，好似天崩地裂，一股恶风冲击，即刻飞尘杂物灌满了整个巷道。在大院里干活的七名工友蒙难了。

发生这次冒顶的前五天，老工人张某和刘贵林在大窑巷道，遇见把头曹德福，向他汇报说：“这几天大窑里，压力大，不能再扒煤柱，不然……”没等刘林把话说完，曹把头就把他训了一顿：“别他妈大惊小怪的，这还用你操心吗？好好干活去，别没事找事。”第三天的半夜里，大房子里的工人正在睡觉，两个特务像幽灵似的，偷偷摸摸地来到了大房子，把张、刘叫了出去。一去几天没有回来，有一个小把头说：“他俩不是良民，是破坏增产报国的思想犯。”从此，在扎费诺尔再也没有见到这两位老工人。

中秋节的第二天清晨，李逢吉大把头的头班工人已到二号井下大窑里。冒顶事故发生了！大窑里面干活的七名工友，奔跑呼救着。他们在两位老工人的带领下，撤到了比较安全的死角躲避起来。在大窑外边推车的两名工友，发现了险情立即向井上跑去，找到曹德福把头，报告险情。曹把头不但不问井下的情况，反而骂道：“别他妈的瞎吵吵，穷他妈的咋呼啥，掉几块煤就向采炭所跑去报告。”但日寇为了封锁消息，不让真相暴露出来，以“休息”为名将这两名工人关押起来。

这样大的事故又怎能封锁住呢？发生冒顶事故的当天上午10点多钟，工人大房子、家属住宅里，街头巷尾到处都传着二号井冒顶的事。到了下班的时间，李振国和陈昌荣的妻子，见自己丈夫没有回家，又听到二号井冒顶，焦急万分，心如刀绞，不顾孩子的哭闹，跑向二号井井口，一些工人、家属也跟着跑去。她俩听到准信之后，当即昏死过去。当工人们听说日本人和曹把头在发生事故后，不顾工人死活，不积极采取救护措施，还把报信的两名工人扣押起来的消息后，怒火冲天，当即在二号井展开了与日本人和曹把头的说理斗争。提出了鲜明的斗争口号：“要活见人，死见尸，立即抢救蒙难工人，如不马上释放被押的两名工友，决不下井采煤。”说理斗争延续到第二天中午，日寇急需煤炭，又怕引起全矿工潮，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所有条件。

一场抢救蒙难工友的紧张战斗开始了。老工人们选择了最佳方案，决定在下山距大窑30米处开口掘进。上面的工友救人心切，忍饥挨饿不分昼夜的轮流干。井下七名工人，千方百计地和死亡作斗争。他们为了保存光明，只用一盏矿灯。他们抱着活着出去的希望，拼命地用手扒着煤块和矸石，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听到几声炮响，隐隐约约听到了矿车的行走声，他

们顿时来了精神，一齐高喊：“有救了，我们有救了。”

外边打下山道的抢救人员，已经整整干了6天6夜。终于在八月二十二日深夜打开了通道，但已有两人惨死在井下。

日本侵略者不按计划、不按正常开采程序、不按地质的客观条件，胡开乱采。他们不顾工人的死活，更不管煤田破坏程度如何。因此扎赉诺尔各个井口被弄得不是起火，就是发水，再就是冒顶，毁井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一天清晨南煤沟北部井，巷道突然来了大压力，一场大面积冒顶事故发生了。两班二十几名工人被堵到井下，他们虽经轮班拼命刨煤壁和冒下来的土矸子，但由于空气稀薄，终于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井上工人十分气愤，大家自动组织起来，向日本人抗议。日本人被迫允许清理巷道，解救巷道里遇难者。10天以后，人们才在洞内找到了死难工友。二十几个人，有躺着死的、有跪着死的、有驮着死的，惨状目不忍睹。一场为死难者申冤，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抗恤死难者家属的罢工斗争开始酝酿。全矿煤炭生产急剧下降，工人们常聚在一起，商量如何找日本人算账。

1944年仲夏，天气异常炎热，闷得人透不过气来。这样的天气，加上驾驶楼里不通风，锅炉又烤人，使得又饿又热的机务人员目锈体乏，难忍难熬，根本无心干活儿。一天，一台机车进库后，司机拉足气门，大开送风器，炉膛里的火星不断顺着烟囱向上冒。因为机车库（机车库房，在老电厂北侧）是用木板钉的临时库房，没有任何防火措施，逐渐烧起来。当人们发现时，库房内已是大火弥漫，人不能靠近，无法补救。这场大火共烧了5个多小时，烧毁了两台机车。

机车库着火后，日本人不停地追查起火原因，始终没有结果。他们首先确定是电源短路引起的火灾，但社长加纳金三郎（原关东军海军中将，扎赉诺尔炭矿株式会社社长）觉得不妥。

因为这样无法向他们的上级——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交待，急得如坐针毡。接着想出一条“蓄意破坏生产”的毒计，将所谓的可疑分子刘树良抓去，严刑拷打，什么老虎凳子、压杆子、灌辣椒水，用遍了酷刑。但刘树良是条硬汉子，始终未“认罪”。加纳金三郎毫无办法，只好派人将刘树良押送海拉尔监狱关押起来。一直到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大炮打响，刘树良乘监狱混乱之机逃出来，才获得了自由。

（摘自《内蒙古文史资料》）

矿山把头是怎样盘剥矿工的

张家珠

把头制度，是一种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它是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的产物。日伪时期西安煤矿的把头和日本侵略者串通一气，狼狈为奸，把头制度已经发展到带有法西斯性质的穷凶极恶程度。

日伪时期西安煤矿有日本把头和汉奸把头。汉奸把头多是由地主、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流氓无赖和工人中极少数败类分子充当。这些人都是向日本侵略者献媚讨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等，讨得他的日本主子欢心，才当上了把头的。那时西安煤矿的把头很多，有名可查的就有42个，二把头、小把头就更多了。把头统一由劳务课管理，大小把头都和坑口的劳务系

大把头那里挂号，向大把头包工，也有少数独立立柜的。把头对矿工的剥削是残酷的，矿工的生死大权都操纵在把头手里。把头对矿工盘剥的手段多得很，主要列举如下：

一、“宝塔式”剥削

所谓“宝塔式”，就是小把头从矿工那里勒索盘剥来的钱，抽出一部分给二把头，二把头再抽出一部分给大把头，大把头也必须给他的日本主子送礼进贡。矿工们把这种“一层吃一层”、“大鱼吃小鱼”的剥削方法叫做“宝塔式”。

另一方面，大把头从日本主子那里包工，一元钱的工资大把头要从中抽出三角钱，然后再包给二把头，经过一层一层的扒皮抽头，到工人名下的工资就没有几个钱了。据《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一书记载：“康德8年（1941年）西安矿业所（即西安煤矿）一个采煤工人每月创造价值1277.46元，平均工资是55元，仅占创造价值的4%。”而方家柜工人牛世清，在康德9年（1942年）11月上了30个工，应得工资仅是32.34元。据当时给矿工工资的人说：“那时采煤工人应得工资是50元至60元，这是把头在给牛世清开资之前，已经从他的工资中扣去了18元至28元钱。”最后又经过七扣八扣，牛世清干了一个月不仅分文没得，还倒欠柜上4.24元。

二、扣不完的“铺底费”

日本侵略者在西安煤矿推行用人换煤的“人肉开采”政策，是把矿工当作“原材料”来消耗的。当地劳动力不够，就让把头各处去抓、招、逼、骗矿工，从中得到一笔钱。当时规定每招收一个华工，给50元的“招募费”，可是把头只给矿工10元钱的“铺底费”，剩余那40元钱就装进了把头的腰包。其实矿工

连那10元钱的“铺底费”也捞不着，而是把头用借款形式贷给的。矿工入矿之后，从第一个月开资就往回扣，月月扣也扣不完。不少矿工一直到死，也没扣完。因此，矿工们说，“铺底费”是还不完的债。原富国矿退休老工人刘玉说，他把把头谢宝香招骗到西安煤矿以后，只借柜上5元钱，赊了一把锹、一顶帽子、三双水袜子，干了三个月的活，不仅没开着工资，还欠大柜把头2.5元。矿工开资得不到钱，把头就向矿工出售和赊销高价商品和放高利贷等剥削矿工，使矿工既受雇佣契约的约束，又受他们的债务约束，这样就造成矿工对把头的依附关系，永远摆脱不了把头的剥削和压榨。

三、开设高价卖店

从各地招骗来的矿工，被押送到西安煤矿登上记、打上手印、编上号码以后，就像鸟进了笼子似的，失去了人身自由，变成了把头的奴隶，成为把头发家致富的“资本”。矿工们被困在电网里，想上街买点什么东西，要费好大力气才能出去一会儿。有的柜头根本不允许矿工出去买东西，只准到把头开设的“卖店”高价买。矿工们说这个“卖店”是无底洞，意思是多少钱也填不满。1935年市场价格高粱米9分一斤，白酒2角一斤，水袜子7角5分一双，而把头“卖店”价格分别是1角2分、3角、1元。丧心病狂的把头还嫌赚钱少，又往米里掺砂子，往酒里兑水，往油里添米汤，以次充好，榨取高额利润。

矿工每天干12个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每天只给五六角钱的“饭票”（这个饭票在市场上不好花）。而把头包伙每个矿工每天得交3角钱，去了伙食费就所剩无几了。这个伙食每天只能吃高粱米、窝窝头和咸菜。到日伪统治后期连高粱米也吃不

着了，窝窝头也变成橡子面的了。矿工在下坑前每人发给两个窝窝头，规定份量是一斤，可把头只做四五两重。把头还告诉伙房故意把饭做“串烟”，使得矿工很难往下咽。逼着矿工吃不饱，不得不到把头开设的“卖店”高价买食品。把头通过发饭票、开卖店、包办伙食等手段，重利盘剥矿工，弄得矿工身上分文没有，债务满身，衣食住完全得依附把头，这好似中世纪地主把农民死死束缚在土地上一样，把头便牢牢地把矿工控制在手下。这种剥削方法断绝了矿工的经济来源，使货币到不了矿工的手，矿工一天到晚的干活，只能做到仅免于饿死。

四、吃空头工资

把头在矿山吃空头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把头向日本主子包工时，本来规定10个人干的活，而把头只用5个人来干，强迫矿工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来完成，这样把头就从中吃了一半的空头。另一种是把头到外地替日本侵略者招募矿工，招来一个人给把头5元钱。有个姓郭的把头，为了得到更多的钱，把他招来的人，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在中途运输中又卖给了其他招工的头，结果很多矿工被押运到漠河等地干活，几乎全部死光。还有一种是外包工，当工程一竣工，把头就携款而逃，工人们只好白干一场。

五、随意克扣矿工工资

矿工们在把头的控制下，一月到头和一年到头，拿不到一个钱，连到柜上问问都不行。把头可以随心所欲地巧立名目。除扣铺底费外，还扣炕长费、共济金、石炭费、事务费以及车牌和矿灯罚款等近20个扣项，像锹镐钱、水袜子钱、柳条帽钱等等，都记在矿工的帐上，真是想不到念不完，都扣得溜光。还

有的把头搞“吃大眼”鬼名堂。那时矿工吃的饭都发霉了，还得让矿工吃，把头就从中想了一个办法，做了许多饼子，在背面印上“大眼”让矿工抓，谁抓到带眼的，到月末就扣谁的工资。上这样当的矿工不少，而把头从中发了财。一方面把饼子高价卖出赚了钱，另一方面把剩下的饭养肥了猪。

六、敲诈勒索

把头他们每月只挣几十元钱，而他们每天大酒大肉的吃着，这钱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矿工那里勒索的。把头常常在大房子里设赌局，如果没有人来耍，就用“请局”的手段，非叫你来不可。谁要是被请上了那就倒了霉，去了只有输。即使你赢了他们也不给钱，而且还必须陪着玩下去，直到矿工把钱输光，才能允许你回去。有的把头不要钱，也要从中抽个红，如果不给拿钱，以后可就麻烦了。把头夏万立勒索矿工金玉华遭拒绝便怀恨在心，有一天在下坑搜身中，夏万立就将一支烟卷放在金玉华的衣袋里，然后就以此为由，在寒冬腊月把金玉华绑在电线杆子上，往身上浇冷水，用棒子打，活活将金玉华折磨死。

七、扣发抚恤金

在日伪统治下的矿山，活人和死人都是把头发财致富的来源。把头不仅绞尽脑汁在活着的矿工身上榨取血汗，就是矿工死了也不放过，还要再扒一层皮。那时规定矿工死后给家属80元的“吊慰费”（也称抚恤金），不仅这个钱被把头扣下，就连给死人的薄皮棺材也偷工减料，好几个死尸装在一个棺材。以后棺材也不给了，把死人身上仅剩的一点衣裳扒光，扔到大坑里或弃在荒山上，让野狗吃掉。这样抚恤金和棺材钱就都叫把

头揣入腰包。

(摘自《辽源文史资料》)

千金寨、欢乐园的“把头”

李荆山 齐纯良 口述
任连生 王洪伟 整理

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抚顺煤矿后，为了加紧掠夺我国煤炭资源，对中国矿工进行了泯灭人性的奴役和敲骨吸髓的压榨。在这场来自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中，抚顺地区的封建把头也在侵略者的利用下，充当了极其丑恶的角色。他们为了分刮矿工的脂膏，甘心效力于日帝，以各种残酷的剥削方式，层层盘剥矿工的汗血，成为日帝鲸吞我国财富残害煤城同胞的帮凶。

千金寨地区封建把头的发迹，一开始就充满血腥味。日帝强占抚顺煤矿后，急需煤炭扩大战争，缓和日本国内的能源危机，便急剧扩大了煤矿的开采量，在大肆扩采千金寨、杨柏堡、老虎台三个煤坑的同时，又先后开凿了大山坑和东乡坑，因而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成倍增加。虽然日帝一再采取派民夫，抓“苦力”，要战俘，搜罗童工以及组织“劳动报国青年队”等办法补充矿工之不足，但开采量与劳力不足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突出。于是日帝利用当地的封建把头，乘华北地区连年遭灾，发生粮荒之机，撒出人马到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安徽、天津、山西、内蒙等地设立“招工事务所”，以到抚顺挖煤做工能吃大米、白面，住楼房，喝自来水，有电灯、电话等等相诱骗，把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诓骗来到千金寨，成为给日本侵略者卖

命的廉价“苦力”。当时有不少封建把头就是在为日帝诓骗大批矿工中，受到了日本人的青睐，自己也暴富了。如牟金义，其人祖籍山东，1917年来到抚顺万达屋煤矿。他以小老婆勾引独身职工的卑鄙手段，逐步积累了一些钱财，因而勾结日本人当上了把头。1923年他回到山东，在直鲁联军担任副官、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26年又回到抚顺投奔管理煤矿的日本大工头度边三郎，充当了龙凤矿大把头。“九·一八”事变后，他的山东老家遭灾，他乘机勾结日本人松本到济宁设立了“抚顺煤矿招工所”，并到济南、南京、北京、天津、吉林等地开设了以招收包工为名的贩卖中国人的“大柜”，为日帝招骗矿工达万余人。他自己也由此发了家，手下雇用了中、小把头及管账先生60多人，掌管矿工1万多人，成了抚顺地区有名的大把头。由于有源源不断的劳力资源，日帝残酷地推行“狂采乱挖”，“人肉开采”，“用人换煤”的罪恶政策，并狂妄地叫嚷：“宁肯多了一吨炭，不怕多死几个人”，“中国苦力大大的有”。因此说封建把头在满足日帝对劳动力需求、扩大煤矿开采量方面是立了“功”的。

日帝对中国矿工在加强野蛮的军事管理的同时，还袭用了旧中国封建把头的管理制度，通过把头压榨矿工的血汗，封建把头一方面为日帝的掠夺效力，一方面自己也层层盘剥矿工，养肥自己。千金寨的煤矿工人，一方面受到外来侵略者的压榨，另一方面还要受当地封建把头的剥削。大批中国劳动力来到煤矿后，被划分给由日本操纵的封建大把头管理。封建把头的组织形式是以大把头为核心，由大把头雇用二把头，二把头雇用小把头，小把头雇用“拉杆的”。“拉杆的”是最小的工头，他们手中拿的五尺杆子既是分配活的度量工具，又是鞭打工人的凶器。当时抚顺地区比较有名的大把头有老虎台矿的郑辅臣、刘复芝；胜利矿沙子井的康品清；露天矿的傅荣俊、金凤阁；新

屯矿的牟金义、高方友；龙凤矿的徐成章、田云阁；万达屋矿的张方亮、姜占元等。郑辅臣曾被称为千金寨第一号大把头，他1909年当黑包工起家，从1911年当上大把头起直至光复共干了38年。在“九·三”胜利当时他手下共有中、小把头27人，所辖矿工6400余人。还同时开办了复兴泉浴池、复兴裕茶庄、老虎台大柜、复兴建筑公司，是公益合等高号的大财东。他在北京有土地90亩，在北京、抚顺等地盖房屋200余间，全部出租，仅这些买卖每年收入就达200余万元，当时可买粮973吨，苞米946吨，白面1217袋。在封建把头内部还分两大类，一类是土建行业把头，主要是为日帝修建铁路和公路，建立交通干线，保证掠夺出的煤炭外运畅通。如土建把头康品清从1913年起，就在大山坑、古城子煤矿、敦化铁路、承德铁路等处大肆包工，把持工人达万余人，为日帝修建铁路、公路达22年之久。另一类就是煤矿业把头，主要是为日帝直接采掘煤炭，他们在日帝的操纵下，分布在千金寨大大小小的各矿坑，形成了一个压榨煤矿工人的整体的采掘网络。这类把头各自分管的矿区一般都比较固定，有的还兼跨土建把头。各类把头内部也有不同的分工，如煤矿大把头牟金义就把所管的把头分为采煤把头、掘进把头、杂业把头、运输把头、通风把头、保安把头 etc 10余种。有的还在内部分为大队、中队、小队。煤矿把头是日帝掠夺我国煤炭资源的“急先锋”。日帝为了保证矿工服从封建把头的监工和管理，防止和镇压矿工的反抗，在各矿区建立和强化了法西斯统治网，在日帝的矿务局、宪兵队、警察署、特高课的严密控制下，还组织了“矿警队”、“督察队”、“密探队”、“洋狗队”。矿警队是专门镇压工人的武装力量；督察队是专门抓捕工人的便衣警察；密探队是暗地监视工人活动的特务组织；洋狗队有几十条狼狗，是专门用来咬工人的。封建把头正是依恃日

本侵略者这些统治、镇压矿工的工具有，来对工人进行肆无忌惮地剥削压榨。

千金寨的封建把头对煤矿工人进行剥削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

1. 包工抽成方法。包工就是封建把头从日帝手里包来活，保证日帝规定的采煤量和工程量，并通过包工抽成的方法层层盘剥工人的血汗。一般来说，封建把头从日帝那里包来几项数量较大的活计后，就再分给二把头，二把头再分包给小把头和“拉杆的”，在分包中层层抽成。工人劳动所得的每一元钱中，大把头抽去20%以上；中把头要抽去10%~15%；小把头和“拉杆的”也要抽5%~10%，这样工人所赚的一元钱最多只能得到五角。如土建大把头崔福庭就是靠包工抽成剥削发了家，他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包工队的记工管账的，后依靠日本人神谷仙次郎办起了义和祥大柜，通过行贿的手段，从日帝那里承揽了南满沿线抚顺、鞍山矿区的开矿、修建铁路、桥梁、公路等土木工程。义和祥大柜最多时有工人1万余人，崔福庭把工程层层分包给中、小把头，每个小把头一般都有20个工人，小把头到义和祥大柜结算时，工资总额中必须抽出一层给崔福庭，相当于一个工人的工钱，没过几年，崔福庭的资产就达到了当时的200万银大洋。崔手下的小把头一年能拿到400~500元钱，而到了工人手里一年只能赚得30元钱。有一个矿业的小把头叫吕启祥，他包下的活儿是每刨一立方米的煤给4角的工钱，而他给矿工的工钱是每刨一车煤得9分钱，二车为一立方米，矿工实际上挖一立方米的煤只得1角8分钱，再去点花销，吕可从一立方米煤中赚得2角钱。那时包工工人，一个好劳动力，一天赚1元5角，一个月可开45元左右，经以上把头的层层盘剥，剩下的也是一二十元钱，而一般工人日工资只赚七八角钱，仅能维持吃饭。在

包工中，封建把头为了更多地剥削矿工的剩余劳动，肥己私囊，他们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最大限度地加重矿工的劳动量。矿工实行日夜两班倒的工作制，工作大都在12个小时以上，第一班矿工早上4点下井，晚上4点升井，第二班矿工紧接着晚上4点下井，早上4点升井，24小时内都有矿工干活。矿工采煤实行计件工资，定额规定很高，有的矿工12小时不停地干也未必能完成定额。封建把头是按照工人的劳动量分发工钱的，一般都采用设红、白、绿三种小牌的方法定工钱，红牌为一等工钱3角3分，白牌为二等工钱3角，绿牌为三等工钱2角5分。井下采煤全靠手刨镐凿，人拉爬犁，人力推车，用手钎子打眼，特别在薄煤层干活就得单腿跪立弯着腰一镐一镐的掏着腰槽，然后打眼放炮，卸煤、装车、推车，一干就是一身汗。由于井下通风差，大巷炮烟长时间排不出去，矿工就得在乌烟瘴气中采煤，条件异常恶劣，正像矿工们说的那样“吃阳间饭干阴间活”。

2. 采取“吃空头”和取货折子的方法。所谓“吃空头”就是中、小把头以虚报冒领工人工资的办法从中获利。由于日帝采取“要煤不要人”的政策，矿工劳动条件异常恶劣，在采煤时又根本得不到必要的安全保障，瓦斯爆炸，煤尘爆炸，水、火、机电设备等恶性事故不断发生，经常有矿工死亡。中小把头在矿工死亡后不除名，继续向上级报工领钱，虚报人数领的工资就揣入了中小把头的腰包。因为大把头的大柜或矿务局劳务系是按照产量的基数发放工钱的，中小把头的虚报冒领，自然要降低实有工人的平均工钱，到头来还是干活的矿工吃亏。“吃空头”的情况在中小把头中是普遍存在的，开始假借死人来虚报人数，到后来干脆死不死人也虚报，少的虚报几个人，多的虚报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人。有个采煤小把头只掌管70余名矿工，

但每次上报都在百人以上。另外，封建把头中还经常使用发给工人取货折子的方法敲诈工人的工资。矿工挣得工钱后，把头们强迫工人将其中一部分钱集中起来放在自己手里，发给工人一个取货折子，工人要买日常用品时就拿着取货折子到指定的商店去买，由于所买的東西只记账没有价，到月底结算时，把头们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因此取货折子所买的物品大都高于一般商店，其中的差价也被把头们搜刮去了。

3. 拉杆的（又称五尺杆子，是指工头来给矿工分配活的量具，每杆长五尺）对矿工的压榨。拉杆的是在第一线直接剥削矿工，矿工要保住饭碗或要多挣钱就得迎合、奉承、顺从拉杆的。一些拉杆的对工人十分苛毒，每当工人开资或逢年过节时，就让工人给他们送礼，花钱多的就另眼相看，即使有个差错或生病误了班也不过分责难。但是矿工劳动所得甚微，有的还要养活一家老小，大多数矿工无力拿出较多的血汗钱满足拉杆的要求，于是拉杆的就在劳动时经常找茬用杆子打工人，对不服管理的矿工更是屡下毒手，常有工人被打伤致残，甚至被毒打致死。据矿工控诉，有时拉杆的所管的工人中十之有六都挨过毒打，有些工人一旦有病不能上班，就被拉杆的上报把头予以监视起来，断绝了矿工的生活。扣发给矿工的劳动配给，如劳动衣和胶鞋等，这类配给物品本来就极少发放，但大都被扣发或用已穿过的破衣旧鞋顶替新的发给工人。矿工吃饭时都在大房子里，由拉杆的发放饭票，发下来的饭票经他们的手就被扣去25~30%，使矿工不能吃到供应的饭量，经常是食不充饥，有的工人因未按点吃上饭，他们也给算上钱，结算时扣除。对死去的矿工，他们也不放过，把其留下的东西变为己有或卖钱私吞。强迫工人买矿里的储蓄票，买完票后，借口为工人保存把票留在自己手里，然后再用此票哄骗其他工人的钱，有的用一

个储蓄票骗了十几个工人的血汗钱。有的拉杆的看到每月开工钱的日期到了，就对一些不服管的工人拳打脚踢，一直打跑为止，跑掉的工人一个月的工钱就归拉杆的所有了。大把头对拉杆的勒索矿工的行为是百般庇护的。如矿工王士贤因拉杆的少给两个工，并扣发了他的胶鞋，王士贤告到了牟金义大柜那里，结果不但没告回东西，第二天还被拉杆的痛打一顿。

4. 开设花烟馆、赌场、妓院坑害矿工。封建把头为了把矿工挣到的血汗钱搜刮一空，还不择手段地把矿工推进烟、赌、妓的火坑。封建把头在矿区附近开办了许多花烟馆，他们在矿工中大肆宣扬吸烟的好处，说什么下井受了累，得了潮湿，吸点大烟（鸦片）可以“驱除寒气，恢复精神”，并能“消愁解闷”。他们开始以赠送请客、尝试等手段相勾引，连续吸食三四天后就上了烟瘾不能自拔。瘾发后如不吸食就流鼻涕，打哈欠，浑身无力，萎靡不振，甚至坐卧不安，心神紊乱，行为严重失常，不得不再吸食，结果逐渐成癖，越陷越深。当时吸上五个烟泡就得一块钱，有不少矿工吸食大烟后，就把所有的钱都投进了花烟馆，宁可不吃不喝，也得花钱吸烟。大烟实在吸不起了，就扎吗啡，扎吗啡的钱也不够了，就抽海洛因，结果不仅吸的两手空空、倾家荡产，而且严重地损害了身体健康，食欲减退，体力衰弱，直至冻饿而死。封建把头们还鼓动矿工要钱玩，特别是到矿工开了工钱后，把头们看见哪个工人的钱还没被扣光，就拉着他们设赌要钱，矿工赢了不让走，输了不许捞，直到把工人的钱赢光为止。有的还要工人借钱来赌，并以不赌就开除相要挟。还有的小把头以抓赌为名，让要钱的工人交费，从中进行勒索。当时在矿区附近开店立铺，摆摊设点的赌场触目皆是，一些大的赌场都是由封建大把头开办或操纵的。赌博的方法有简有繁，花样翻新，比较常见的有推牌九、打骨牌、打扑

克、打飞子，猜单双、抽签筒、猜铜钱等，由于方法比较简单易学，赌主开始又以小数额的赌资相诱惑，致使不少矿工误入歧途。有的矿工侥幸赢了一二次后，赌瘾大发，岂不知这是赌主做弄的圈套，一再赌下去的结果只能是越赌越输，有的输光了衣裤和仅有的家当，有的把几年节衣缩食的积蓄丢进了赌场，因赌断送了性命的矿工难以数计。封建把头还在矿区附近开办了许多妓院，逼迫一些缺乏生计来源的良家妇女为娼卖淫，勾引矿工下水。封建大把头牟金义就是以开妓院而臭名千金寨的，他在新屯矿区买下了几十间房子，开办了颇具规模的妓院。牟金义每月收妓院的房租就净赚350元，18月收入6300余元。为了拉拢矿工，下班多的矿工给一张窑子盘票，看妓女不花钱。当时抚顺地区逛妓院的人百分之八十是矿工，由于这些淫乱场所大都是公开化的，无人制止和取缔，任其泛滥，所以封建把头可以毫无顾忌的坐收这笔黑钱。

封建把头效力于日帝，百般盘剥、压榨矿工的血汗，个个都成了暴发户。除郑辅臣、崔福庭上面已谈到外，牟金义在当大把头期间共买有房产153间，并办行当四处，赚到的伪币9450余万元，按各个时期不同的粮价核算可买高粱米1亿多斤。康品清有房产191间，办卖店三处，赚到的伪币21万余元。其他的十几个大把头赚到的产业也都有十几万或几十万元之巨。而广大矿工的悲惨命运与封建把头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工作生活条件，以及种种非人的待遇，卑劣的诱惑，使他们生活在人间地狱之中，许许多多矿工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

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
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

www.krzzjh.com